

治理现代化

ZHILI XIANDAIHUA YANJIU

研究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公方彬 王续添 冯鹏志 刘海涛 孙久文
张志明 杨 阳 杨金海 郁建兴 郭建宁
黄群慧 韩庆祥 赖德胜

编辑委员会

主任：魏四海

副主任：吴云廷 闻建波 赵印良 李胜茹(执行)

张月军 姚自忠 曹社英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亚博 王小玲 王宇飞 王秀华 冯学工
孙英臣 朱艳秋 李凤瑞 李进英 李彦青
冷宣荣 杨福忠 庞立平 孟庆云 哈伯先
贾永江 程瑞山 路淑芳 穆瑞丽

主 编 孙英臣

副 主 编 于亚博 朱艳秋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主管主办

治理现代化研究 (双月刊)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 崔德华(05)
- 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阐述与重大部署 郭明英, 沈 陈(13)

特 稿

深刻理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命题

- 恩格斯《论权威》的当代启示 洪向华, 张 杨(19)

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 刘 仓, 杨 璐(26)
-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传承发展与现实启示 杨 昕, 张荣臣(36)
- 身份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实践逻辑之新视角 张 欣(44)

2020年 第2期

2020年3月10日出版

第36卷 总第272期

经济治理与经济建设

雄安新区引领下的河北主动、创新发展研究 刘 楷(50)

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 梁军峰(57)

基于NVivo的基层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质性研究 王 飞, 刘步先, 梁 坤(63)

文化治理与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视域下红色文化价值的系统审视 田 野, 陈 思(69)

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

“五权耦合”推进社会高质量叠化发展研究 杜宏巍, 许正中(75)

社区协商中的公众参与效能感研究 杨守涛(81)

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视阈下的新时代绿色发展探析 刘希刚, 郭 凯(90)

英文编校:刘 博

美术编辑:李 聪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No.2, 2020, (Vol.36, General No.272)

Contents

-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isk Prevention
..... CUI De-hua (05)
- Xi Jinping's Theory Elaboration and Major Deployment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GUO Ming-ying, SHEN Chen (13)
-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Firmly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Engels's *On Authority*..... HONG Xiang-hua, ZHANG Yang (19)
- The Successful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in the New Era
—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 LIU Cang, YANG Lu (26)
-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Hardship Consciousness
..... YANG Xin, ZHANG Rong-chen (36)
-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afeguar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re ZHANG Xin (44)
- Research on the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ong'an New Area
..... LIU Kai (50)
-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in the Political Field LIANG Jun-feng (57)
-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ization Supervis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Based on NVivo
..... WANG Fei, LIU Bu-xian, LIANG Kun (63)
- A Systematic Survey of the Value of Red Culture in the View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IAN Ye, CHEN Si (69)
- Research on "Five Power Coupl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Overlapping Society
..... DU Hong-wei, XU Zheng-zhong (75)
-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Consultation YANG Shou-tao (81)
-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 LIU Xi-gang, GUO Kai (90)
-
-

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

崔德华^{1,2}

(1.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237;

2. 山东交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前国际国内风险动荡源和风险点日益增多的敏锐观察和理论创新。这一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观、“具有先手”的风险准备观、“守土尽责”的风险责任观、“驾驭风险”的风险本领观、“敢于斗争”的风险意志观、“健全机制”的风险实践观。这些基本内涵具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强烈的问题导向、辩证的底线思维、高瞻远瞩和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等鲜明时代特征。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党要主动践行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相关内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全面提升防范风险能力,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磅礴之力,补齐风险防范“短板”,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发挥制度威力,为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

关键词:习近平;风险防范;三大攻坚战;民生福祉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05-08

当前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及时察觉风险苗头,敏锐感知风险状态,防风险于未萌,控风险于未发,减少风险挑战与人民对和谐安定美好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张力,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党以新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方略加以破解。基于此,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以恢宏的时代视野和高瞻的战略眼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将风险治理关口前移,强化风险防范和源头治理,提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

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1]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坚持顶层设计、科学部署、统筹谋划,形成了内涵深邃、系统完善的风险防范理论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党高度重视风险、积极防范风险、科学研判风险、主动回应风险、有效化解风险,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收稿日期: 2020-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礼仪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8BKS04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我国社会风险防范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研究”(2014M551931);山东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研究”(J15WB3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亲和力提升研究”(19CSZJ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德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发展问题。

一、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一)“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观

所谓风险意识观,是指人们根据既有经验对风险的主观判断、思想认知、心理感受和应对态度,影响着人们防范风险的具体实践行动。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广阔视野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站在时代前列,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强烈鲜明的问题意识、准确理性的判断力,深刻洞悉到一系列重大风险不断涌现的严峻现实,充分彰显其强烈的忧患感悟、敏锐的风险意识,善于观察风险、深刻洞悉风险、精准认识风险、科学研判风险,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奠定坚实基础。

2013年1月,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2](P23)}。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1]2019年11月,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3]面对国际国内风险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的严峻挑战,习近平以果敢的政治魄力,强烈的“居安思危”风险意识,立足时代、顺应大势、着眼大局,未雨绸缪、及时预警、科学预测,为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直面风险挑战,理性判断风险,积极而为,砥砺前行,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

(二)“具有先手”的风险准备观

所谓风险准备观,是指面对风险的严峻考验,人们能够积极有为,为防范化解风险做实做细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力争牢牢把握打赢风险防范攻坚战主动权的思想认知。习近平以战略家的胆识和实干家的魄力,

深刻认识到要有效防范风险,必须具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刚毅态度,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防范化解风险的各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由此形成了“具有先手”的风险准备观。2018年1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4]。

应该认识到,当前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良好机遇,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有机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的产生领域更加多元、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内在原因更加复杂、扩散速度更加快捷、涉及人群更加广泛、造成后果更加严重,它们之间彼此渗透、相互交织,具有极强的连锁反应能力。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必须将风险治理关口前移,做好风险的前期准备工作,这种风险准备观对我们党贯彻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务实精神,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5],牢牢掌握防范风险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守土尽责”的风险责任观

所谓风险责任观,是指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人们不断加强自身责任觉悟的内化,承担相应风险防范责任的主观认知和态度,它是风险防范责任意识产生的内生动力源,能有效避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不良倾向和陷入防范化解风险主体空转或缺失的怪圈。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风险不断涌现,已成为连锁联动的综合体,对我国总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防范化解风险势在必行,迫切需要我们党具有坚定的政治勇气和高度的责任担当,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觉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期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始终放在心上,主动扛在肩上,自觉融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之中,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不畏风险压力、积极回应风险挑战。

习近平以“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2](P102)}的赤子情怀,充分认识到我们党防范化解风险、增进民生福祉的责任高于一切,突出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

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1]我们党必须增强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自觉树立责任意识,强化责任心,做到履职有责、勇于负责、善于尽责,不漠视、不推诿、不逃避,绝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6](P82)}。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不仅要具有勇于担当的意识觉悟,还必须具有善于担当的能力,掌握系统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负重前行、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主心骨和领导核心作用,将人们对安定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铭记于心,充分调动亿万民众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性、创造性,利用蕴藏在民众中的无穷智慧,形成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卓有成效地防范化解风险,全面增进民生福祉。

(四)“驾驭风险”的风险本领观

所谓风险本领观,是指在防范和回应风险过程中,人们注重培养能够洞察风险、预警风险、研判风险、治理风险的能力,进而有效控制风险的思想认知。“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理性认识到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具有克服、战胜和驾驭风险的高超本领,方能把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化险为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的新理念新思路,是新时代我们党亟待增强的八大执政本领之一,成为我们党防范化解风险、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和行动指南。具有高超驾驭风险本领,就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6](P67)}具体而言,首先要具有敏锐洞察风险的本领,“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7];其次要具有科学研判风险的本领,探寻风险发生之源、风险传播领域、风险扩散路径,反思风险防范短板,以求持续改进之策;最后要具有科学谋划风险的本领。习近平强调要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进行统筹谋划、科学部署,“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

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1]

(五)“敢于斗争”的风险意志观

所谓风险意志观,是指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人们自觉支配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动力特性和思想认识。要正确认识、有效解决风险问题,对于我们党来说必须自觉树立起敢于同风险作斗争的勇气,塑造最终战胜风险、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有信心。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以宏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6](P222)}这句话充分彰显习近平高瞻远瞩的时代判断、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和勇于回应风险的斗争精神,成为指引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凝心聚力防范风险、勇往直前治理风险,最终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这一战略任务的响亮口号。

防范化解风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进行的伟大斗争,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道路长,直接关乎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乎我们党的执政公信力能否坚不可摧,更关乎我国总体安全是否能实现,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求我们党必须具有勇于同风险决战的斗争精神和坚定顽强的斗争意志。2019年1月,习近平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时刻保持“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2019年9月,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应对“五个危害风险”挑战,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牢固斗争立场,对标正确斗争方向,秉承科学斗争原则,勇于发扬斗争精神,掌握灵活斗争谋略,做到“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7]。这就要求我们党不为风险所惑、不为风险所困、不为风险所惧、不为风险而退,主动回应、迎难而上、积极有为,做到勇于直面风险挑战,善于同风险作斗争,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既要全面提升驾驭风险的斗争本领,又要具有不战胜风险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保持突出的政治定力和勇往

直前的坚强决心,为破解防范风险时代难题、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艰巨任务勇于负重前行。

(六)“健全机制”的风险实践观

所谓风险实践观,是指注重风险源于实践活动,又必须回到实践活动之中,人们据此进行防范化解风险的思想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理论落地生根发芽的重要途径。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不仅要有敢于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坚强魄力,更要立足世情国情深刻变迁,全力聚焦防范风险“短板”,冲破风险治理“藩篱”,建立健全一整套涵盖预防预警、精准识别、科学研判、主动回应、及时善后等环节于一体、反应快捷、信息畅通、连锁联动、责任明确、科学高效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为防范化解风险增“长板”、补“短板”、固“底板”奠定坚实根基。

习近平认识到,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做到建立起包括多环节、多领域、多部门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近在咫尺,增进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蓝图指日可待,但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风险犹如无数“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造成深刻影响,我们党只有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探究风险涌现之源、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不断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为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才能成功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孕育于时代挑战的背景之中,是对挑战主动回应的产物”^{[8](P159)},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具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总体判断,是对时代发展变迁的敏锐观察、准确分析

和科学研判,充分彰显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面对激烈的时代变迁,他指出:“我们现在搞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5]

这一论述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又彰显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的宝贵品质。一方面,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主流趋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风险因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共生共存,对世界和平、人类共同利益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习近平着眼于当前国情党情的巨大变革,准确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比任何时期更接近伟大复兴中国梦,但同样也进入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社会矛盾深刻变迁,风险现实与民众对稳定和谐生活追求之间的张力加大。基于此,习近平敏锐感知我们党承担的改革发展稳定之重任前所未有,依然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风险不断涌现的复杂形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既要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和历史方位,宏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又要善于聚焦重点、抓住关键,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新思路新判断新观点,将我们党对时代整体判断、国际国内风险发展态势和风险防范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充分彰显其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实践,敢于直面风险挑战,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优良品格。

(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反映、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回音。具有敏锐的时代感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倾听时代声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高瞻预测时代趋势,是我们党正确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最终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彰显我们党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无比坚强的政治定力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习近平充分认识到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强烈的问题导向,形成积极的问题意识,具有观察问题的敏锐性、正视问题的清醒性、研判问题的精准性、回应问题的主动性、解决问题的高效性,精准聚焦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迁,理性研判所蕴含的诸多风险挑战。

2013年11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2](P74)}。习近平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强烈的问题导向、准确的判断力,敏锐洞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风险景象,告诫全党:“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6](P81)}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恢宏的战略思维,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精准分析问题,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历史与时代、国际与国内、风险与发展、现实与未来等辩证关系,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指向。

(三)具有辩证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式,强调既立足现实,把握各种机会,强动力、固根基、扬优势,又着眼长远,考虑事情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坚持兜底原则,努力争取最有利、最美好的结果。底线思维是忧患意识、预防意识、前瞻意识、责任意识 and 回应意识的综合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贯彻运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倡导的新思路新方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很多场合,习近平都着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底线和边界,增强忧患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充分考虑各种不足和困境,守底线、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做实做细做好各种准备,牢牢掌握防范风险的有利先机和主动权,这充分彰显习近平扎实的哲学理论功底、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突出的辩证思维能力。

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1]从风险防范角度来看,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做到既保持敏锐的风险防范意识,善于察觉和识别风险,对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觉性,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境和难题,做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又要具有高度自信、坚强定力、不慌不乱、积极有为、勇于担当,谨慎而行、顺势而动、积极而为,采取有效措施,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和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在保障兜底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实现最好的结果;既要充分认识到风险带来的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又要深刻理解风险蕴含的积极之处和良好机会,理性思考如何化不利为有利、变挑战为机遇,防止风险进一步连锁联动、递增大,力争把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全力维护社会和谐;既要避免任意突破底线、跨越边界,又要敢于放开手脚,树立长远目标,敢于创新、开拓进取,抢占风险防范制高点。

(四)具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一种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握时代主题变化,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和预见事物未来发展总体趋势的思维方法,具有对问题分析的广度、高度和深度。从价值意蕴来看,战略思维理念充分体现和全程贯穿于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之中,主要体现为:一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迁,高度重视和谐发展与风险防范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和关键问题,又注重统揽全局、补齐短板,防止不同领域风险的蔓延、递增和放大,全力推进维护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安全大环境。二是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战略任务之一。在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战略任务,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凸显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战略地位,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三是将防范风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结合起

来。习近平认识到防范化解风险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和实现程度,“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6](P72)}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以突出的战略思维,为我们党立足时代深刻变迁,敏锐观察风险、科学研判风险、有效解决风险,增进民生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和谐良好、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和思路启示。

三、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需要我们党站在时代发展前列,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践行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居安思危,全面提升防范风险能力,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汇聚防范风险的磅礴之力,力争把握风险防范的主动权,为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增强防范风险的政治定力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头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善于观察和理性分析面临的风险现实,推进防范风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实现新突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为更好地防范化解风险,践行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必须不遗余力地聚焦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观察认识和科学研判风险。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立足时代特点,以大视野、大格局观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这一时代课题,以大境界、大胸怀理性认识自身优势和短板所在,以大智慧、大担当充分发挥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二是要辩证分析面临的风险

现实,坚定战胜风险自信心。既要充分认识诸多风险产生的深刻时代背景,准确把握这些风险涌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又要结合我国的现实需要,科学认识这些风险发生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既要看到风险单独存在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又要长远预测这些风险交织叠加、连锁联动带来的严重后果;既要及时洞悉风险不断涌现的严峻现实,又要深入探究这些风险持续增强的深层原因,把握风险发展演变的未来趋势;既要看到风险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巨大考验,又要理解这些风险对我们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的历练战场;既要看到防范风险绝不会一蹴而就,将经历“永远在路上”的艰辛探索,又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良好心态,坚定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必胜信念。三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直面风险挑战。既要时刻提防风险,又要充分发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拼搏精神,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本领,自觉塑造勇于防范风险、善于防范风险的斗争意识,永葆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打好每一场防范风险战斗,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成功战胜风险这只“拦路虎”和“绊脚石”,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增进民生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保驾护航。

(二)立足时代发展变革,全面提升防范风险能力

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绝非易事,需要我们党全面提升防范风险能力,推进风险防范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一是要提升善于观察风险、洞悉风险的能力。从风险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来看,风险会经历一个从未萌到苗头、从隐藏到显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这就需要提高风险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6](P82)}二是要提升正确认识、科学研判风险的能力。正确认识和科学研判风险类型、表现形式、内在根源、传播路径、扩散速度、造成影响等诸多关键因素,面对风险心中有底数、脚下有力量、努力有方向。三是要提升积极回应、掌控风险的能力。要做到顺势而为,积极回应、主动防范,具有突出的驾驭风险能力,强化能力保障,避

免防范风险失控,导致各种风险如“脱缰的野马”肆意而为、递增放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四是要提升精心谋划、统筹安排的能力。防范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多方面资源,需要我们党发挥领导核心和主心骨作用,全面提升精心谋划、科学部署、协同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风险治理体系,统筹推进防风险、促改革、补短板、惠民生、增福祉等各项工作。五是要提升风险防范体制创新能力、补齐机制短板。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需要不断创新风险防范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威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9],为防范风险加固制度“底板”,扎紧体制机制藩篱,把风险牢牢控制在科学合理的框架之内,减少风险发生、放大和动荡,营造良好的社会安全氛围。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防范风险的磅礴之力

相信和依靠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不竭动力。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情怀、秉承坚决依靠人民的政治立场,强调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不断为人民造福。同样,要防范化解风险,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也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激发蕴藏在民众中的磅礴力量。

2019年2月,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10]要有效破解风险防范这一时代难题,我们党必须发挥战斗堡垒的核心作用,成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场伟大斗争的主心骨,更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场斗争之中,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充分调动其参与风险防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磅礴力量,准确回答、有效破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道时代“大题”,向全国人民交上一份增进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优异“答卷”,让人民群众成为

检验风险防范成果的“阅卷人”,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使我们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防范化解风险、促进社会和谐、谋求民生福祉,始终是永恒的时代主题,“人类是在风险中推进历史进步的,而且这种风险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11](P186)}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是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百年大发展深刻变迁的敏锐观察,是对国际国内风险严峻挑战的积极回应,深刻揭示了防范化解风险已成为难以规避的时代主题,阐明了防范化解风险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辩证逻辑关系,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风险防范理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增添了新内容、赋予了新内涵。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12]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发展与安全、风险与机遇是两个重大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必将为有效防控风险,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减少风险挑战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张力,增进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固本强基、保驾护航,为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为引领全球风险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张洋.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9-11-06(4).
- [4]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OL].(2018-01-15).http://www.gov.cn/zhuanti/2018-01/05/content_5253681.htm.

- [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OL].(2016-05-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0/c_128972667.htm.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N].人民日报,2019-09-04(1).
- [8] 徐艳玲.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M].北京:学
- 习出版社,2017.
- [9]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 [10] 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2-04(1).
- [11] 龚培河,万丽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0-01-01(1).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isk Prevention

CUI De-hua^{1,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isk prevention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a keen observ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isk turbulence sources and increasing risk points. This important discourse has rich basic connotations, which mainly include the concept of risk consciousness of "being safe and secure", the concept of "prepared with risk", the concept of risk responsibility of "keeping the ground responsible", the concept of risk management of "managing risks", the concept of "the dare to fight" and the risk practice concept of "sound mechanism". These basic connotations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strong sense of problems, a dialectical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a prominent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Party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isk prevention, take Marxism as a housekeeping skil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to prevent risks, gather the power of the masses,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isk preven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s, use the power of the system,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major risk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Key Words: Xi Jinping; risk prevention; three major battles; people's well-being

责任编辑:刘 博

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理论阐述与重大部署

郭明英¹, 沈 陈²

(1.国家统计局 统计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826; 2.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面临来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习近平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尽管具有双刃剑效应,但仍符合世界大势和历史规律。解决经济全球化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五大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适度引导,使各国家、各阶层的人群都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中国为构建开放型经贸格局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重大部署,这些部署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擎,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明确路径。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全球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13-06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资本、服务、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使世界经济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似乎陷入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等声音不绝于耳。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等国内外重大场合发表讲话,详细阐述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考和研判,探索解决当前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根本路径,提出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总体分析与研判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1]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今天,既要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仍符合世界历史大势和经济发展规律。

(一)认真审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近年来,多边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全球化面临空前冲击和挑战。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

收稿日期:2019-11-01

基金项目: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国际比较分析”(项目编号:2019LY80);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巴西变局冲击下的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推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课题“新兴国家政党发展研究:以南非为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明英,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统计、区域经济一体化;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2]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受到的冲击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丧失了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垄断地位,转而在市场经济地位、发展中国家身份等问题上做文章,要求重新修改国际经贸规则,以维持本国在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为了迫使其他贸易伙伴接受修改经贸规则的要求,他们采取极限施压等手段,大搞贸易保护、贸易制裁。

二是单边主义挑战加剧。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已经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诸多国际组织和协定,还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给全球治理进程带来严峻挑战。单边主义抛弃了平等协商的合作精神,试图构建一种等级的、排他的国际秩序。具体来说,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对部分国家施以压迫,遭到美国讹诈的国家选择与美国达成妥协,然后再去讹诈剩余国家来进行弥补,这些国家要么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协议,要么受到排斥和差别对待,进而被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

三是国际机制无力约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为。由于多数国际机构和平台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无法得到有效遏制。2019年12月11日,由于美国阻挠大法官任命而缺少有效运行人数,被誉为国际贸易的“最高法院”的WTO上诉机构正式停摆。在金融、气候等其他领域出现的全球治理僵局也足以说明,现行国际机制难以遏制美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的破坏。

(二)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存在的双刃剑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要看到冷战以来世界经济空前增长与繁荣,也必须承认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公平赤字出现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拉大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发达国家的中下层选民成为反全球化、反移民的主力军,民粹主义政党纷纷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浪潮席卷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美国家,甚至蔓延到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产生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

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3](P447)}看待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必须用正确理性的态度。全球发展困境不全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恐怖主义、地缘冲突、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问题同样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无异于因噎废食,不仅无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反而会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因此,解决全球问题必须直面经济全球化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通过全球治理进行必要的引导和重塑,使全球经济更加包容和充满活力。

(三)认清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历史潮流

在2014年11月28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他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3](P442)}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本流动、商品交易、科技传播和各国民众交往,又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随着第四次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兴起,国际分工加速调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创新链、数据链、人才链进行人为切断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必须借助全球资源有效配置来展开。

从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来看,积极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主动学习人类科技成果和各国发展经验,才能推动本国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有人担心外国公司进入可能颠覆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入世谈判中,也有人担心中国企业失去关税保护将无法参与竞争,导致中国市场被外国公司占领。后来的结果证明,开放是发展壮大的必要条

件,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经历过数次高潮,也因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原因而出现重大挫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围绕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资本投入与劳动价值等关系的矛盾趋于放大。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调整或者曲折是正常的,暂时的挫折不会影响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习近平基于经济客观规律和中国发展经验两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为经济全球化提振了信心,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习近平关于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思想理念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并不意味着要回归西方国家主导的市场至上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与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五大价值理念的指导下,适度引导和调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促进各国、各阶层民众实现互利共赢。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五大价值理念与国家治理中的“五位一体”布局相呼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世界意义。

(一)坚持将对外开放作为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策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3](P512)}国际贸易理论早已证明,自由贸易能够促进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实现要素禀赋的有效配置;相反,采取提升关税、设置壁垒等与邻为壑的手段,不仅带来国际贸易的阻塞,最终也将损害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增长迅速,一度创造“拉美奇迹”。但是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冲刺阶段,拉美国家未能把握好开放与发展的关系,纷纷采取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从而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中国于1979年以后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断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通性、

互动性、交融性,最终实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历史性变革,朝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世界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各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释放全球经贸合作潜力,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局。

(二)从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塑造包容发展的价值理念

包容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在文化层面,尊重文明的差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过去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强推西方制度、价值和文明,试图将西方文明包装成“普世价值”用以取代其他文明,使全球化演变成西方化;近来西方国家又宣扬“文明冲突”,刻意制造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隔阂。中国既反对西方文明一家独大的傲慢思维,也反对完全排斥其他文明的极端思维,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包容、交流互鉴,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同时要积极学习他国的先进发展理念,将文明之间的多样化与差异性转化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在经济层面,要看到市场经济鼓励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一面,也不能忽视完全奉行自由市场原则可能带来过度自利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源头是美国松弛的信用标准导致房地产借贷泛滥,华尔街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这些高风险的贷款转换成资产证券,引发后来的次级按揭危机。在此过程中,美国如果在信用标准或者证券买卖环节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华尔街的过度自利行为,都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危机的破坏。这一历史教训证明政府必须发挥相应的监管和调控作用,注重不同利益阶层的包容发展。

(三)坚持普惠理念,增强广大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普惠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涉及人类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等多个评价标准。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

福感。”^[5]普惠发展要求各国、各阶层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其中弱势群体是关注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普惠发展致力于减少贫困人口和促进社会公平,但并不等同于向弱势群体提供慈善救助。除了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的人道主义援助,普惠发展绝大部分通过贸易、金融和技术培训等方式展开,推动普惠贸易、普惠金融、普惠教育,由直接进行输血向提升造血功能转变。推动普惠贸易、普惠金融、普惠教育必须注重政策扶持与倾斜,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坚持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总之,普惠发展的目标是使弱势群体获得自主生产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出口贸易,避免因援助依赖带来永久贫困。

(四)通过再平衡释放更多经济全球化的正效应

事物的发展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这一论断放到国际层面同样有效,即世界经济不平衡不充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带来世界整体繁荣,但也造成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某些领域畸形发展形成所谓科技泡沫、金融危机;不少国家因产业空心化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等等。尽管中国基本不存在以上问题,但仍需要预防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风险。中国已多次表示不刻意追求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快的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反而会增大外汇储备的存储成本和保值压力。因此,在充满不平衡的国际环境中,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处理好各地区、各领域、各部门的关系,促进各方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趋于平衡。还要以底线思维、系统思维为统领,积极研究国际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因素,推进世界经济平衡、健康发展,释放更多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

(五)坚持以合作共赢为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首先,合作共赢是一种思维方式。由于各国之间的联通交融程度不断加强,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独善其身。因此,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

树立互利共赢理念,摒弃大小通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其次,合作共赢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如何实现“和则两利”、避免“斗则两输”,必须要找到各方的利益均衡点和交汇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分配。最后,合作共赢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通过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各国应以负责任态度共同应对全球风险与挑战,放大正面的合作效应,减少负面的外溢效应。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多次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组织,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国际市场反复动荡,反过来也延缓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相反,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危机蔓延,最终挽救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局势。

三、习近平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明确发出支持和引领全球化的声音:“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6]按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重大部署,中国将从四个方面构建开放型经贸格局。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打开国门搞建设。国内体制改革是扩大对外的基础,提升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增加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量和范围,截至2019年8月,共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形成“1+3+7+1+6”的自贸试验区格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7](P153)}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兴建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主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努力削减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扩大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完善相关法规,营造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制定新的《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深入实施新版外商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金融业、农业、矿业等部门的外资持股比例。强化执法力度,特别是加强在知识产权、投资权益等方

面的保护力度,完善信息通报、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从第46位上升到第31位,提升了15位。针对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可以有效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内外要素禀赋的有序流动、高效配置和深度融合。

第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经济规模;二是具有国际贸易的领先地位;三是具有作为最后支付人的雄厚资本。“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两条路线包含一系列正在建设的经济走廊和重点项目。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初衷是让沿线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红利,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融资机构,为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唱戏,而是为沿线各国搭建共同合唱的平台。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中国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了世界广泛支持,“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转化为行动,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而形成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新格局。

第三,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南南合作和缩小南北差距。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的外交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继续倡导和贯彻正确义利观,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在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上,中国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①,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名额,15万个奖学金名额,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在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中举行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

话会上,中国承诺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提供5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难民、气候变化、饥荒、公共卫生等挑战;同时通过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教育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个来华培训名额。在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援助疲劳”的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团结互助,为南南合作开启了崭新的繁荣之路,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

第四,实施多层次自由贸易战略,构建开放型经贸格局。在多层层面,抵制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径,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处于停滞的WTO贸易审查和争端解决机制。在强化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区域和双边层面,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加紧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中国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网络,目前已签署17个自贸协定,正在推进12个自贸协定谈判,正在研究8个自贸协定。在个体层面,中国于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次在上海召开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彰显了中国构建开放型经贸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四、结 语

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会改变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潮流,也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势。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世界大势的把握,习近平对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做了深入的理论阐述,彰显了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的时代精神。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并非一时之举,而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保持健康稳定,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高水平开放,正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中国将继续做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并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这些战略部署反映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态势,也回应了发

^①“6个100”项目是指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展中国家要求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明确路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04(2).

[2]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0-17(2).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5]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11-21(3).

[6]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09-04(3).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8] 习近平.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11-06(3).

Xi Jinping's Theory Elaboration and Major Deployment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UO Ming-ying¹, SHEN Chen²

(1.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eijing 100826, China;

2.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In this regard, Xi Jinping made an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it still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 must properly guid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ive values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universal benefit, balance and all-win, so that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and at all levels can share in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made major arrangements in four areas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trade. These arrangements will serve as the engine of a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hart a clear path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责任编辑:刘 博

深刻理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命题

——恩格斯《论权威》的当代启示

洪向华, 张 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 北京 100091)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觉醒、崛起和腾飞的核心领导力量,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恩格斯《论权威》中包含的权威思想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认识权威, 了解权威与服从、权威与自治关系的理论蓝本。当前, 中国现代化转型所产生的多元价值的冲突、利益格局分化、党内腐败滋生等问题使政党权威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为消除权威危机的存在因素, 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 重新审视权威何以重要, 正确认识维护新时代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 积极引入法治权威, 实现政党与法治的良性互动, 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

关键词: 党中央权威; 权力; 服从; 自治; “两个维护”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19-07

恩格斯的《论权威》发表距今将近150年, 虽经时代变迁, 但这篇文章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却依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依然是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学理依据。《论权威》原是恩格斯为批判和揭露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的虚伪和空想的战斗檄文, 后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组织和建立政党权威的重要理论文件。在权威消亡的社会条件产生之前, 权威依旧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组织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因政党本质属性的内生权威与政党领导效力的外生权威而得以牢固树立, 但随着社会全领域的现代化转型, 对人民赋予权力兑现的应然状态与效力未满的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 产生了诸多消解党中央权威的负面因素。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习近平指出, “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各项制度”,^[1]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上升到制度层面。对此, 我们有必要从思想认知上厘清权威的必要性, 认识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性, 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夯实理论之基。

一、《论权威》中 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三重辨析

权威是人类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现象, 对于社会革命、政治秩序、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都具有重要作用。《论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集中表达, 对于权威的内涵界定, 为何要坚持权威, 权威与服从以及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解答, 是树立和坚定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学理支撑。

(一) 权威内涵的界定

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权威是什么进行

收稿日期: 2019-12-18

作者简介: 洪向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督学,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前沿问题; 张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18级思政专业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前沿问题。

了详细辨析。权威,从词源上或是从字面上来看,都是将权与威分开来解读。“权”,在本意上是指一种特有的实质性权力,而“威”则侧重于因权而生的认同和服从。综合来讲,就是恩格斯在文本中对权威内涵的界定:“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P274)}显而易见,权威不仅是实质性权力的强制,还包含有意志上的自愿服从,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内涵之中。因此,权威的服从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状态。概言之,强制性权威是政治统治中的专制和专断;而非强制性权威则表现为自觉、自愿的服从,但这种服从应是理性的选择,而非盲目的崇拜和迷信。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人们服从一定权威的依据更加多元,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执政党追求非强制性权威。

权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存在和消亡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权威是一种社会必然存在物。马克思主义指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最初是借助对人的依赖关系而形成的属人社会形态,这种群体性生活亟须一个领袖人物或领导核心来组织生产、协调矛盾和维护秩序,以确保群体共生。当组织、协调和维护的社会功能必须稳定于某个个体或是群体时,权威就产生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范围的扩大,人类社会对权威的需求非但没有减弱或消失,反而愈益增强。从本质上来讲,权威不仅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的必然需求。第二,权威具有历史性,是产生、存在、发展与消亡的历史性过程的统一。反权威主义者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在使权威消亡的社会条件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废除一切权威,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3](P277)}在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权威内涵的认知,权威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历史的,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自然过程。

(二)权威与服从关系的辨析

权威的存在必须以服从作为前提条件,权威从本质上来讲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对此,恩格斯指出:

“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P274)}不难看出,恩格斯在这里把权威存在的前提放在服从之上,就是说任何权威都必须以服从为依托,并且这种服从来自人民群众的理性判断、选择和信任。服从是权威生成的基础,并且对权威的服从是有条件的。权威服从的存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方面是革命或是夺取政权之需;另一方面是巩固执政地位之需。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指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3](P277)}巴枯宁没有看到权威的力量和权威的本质,认为一切权威都是有害的、压迫的和虚伪的,并且污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人民的统治的名义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4](P296)}忽略权威的必然性、历史性和条件性而作出的对权威的判断,必然是带有局限性的认知。对权威的服从必须依据时代条件和现实需要来判断,“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8](P258)}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反权威主义者高呼的这些口号脱离了历史时代的现实之需,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最终篡夺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这充分暴露了反权威主义者只不过是虚伪的“两面人”。

(三)权威与自治关系的厘定

权威与自治关系的厘定是对“权威就是绝对坏的、自治就是绝对好的”这一充满偏见的狭隘认知的回击。权威与自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5](P276-277)}权威与自由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没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P276)},无节制的自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反之,绝对的权威也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寻求权威与自由的平衡,任何一方的过度都会导致社会失衡,扰乱社会正常的发展。巴枯宁宣扬“无条件地排除任何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必须排斥一切权威原则,而把自治原则作为革命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绝对原则”。^{[4](P74)}针对巴枯宁派的这种荒谬观点和认知,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

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5](P502)}权威与自治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两个关系范畴,不加任何束缚与限制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仅仅以暴力为支撑的强权权威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抗议。权威应当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自治应当在权威的指导之下运行。此外,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有两个逻辑在里面。一个是权威与自治这两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相对性,二者是相互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另一个是权威和自治在历史时空中的相对性,二者都是历史存在物,必然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发展乃至消亡。而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反权威主义者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只承认自由的绝对性,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反动的。绝对的权威将会走向奴役之路,绝对的自治将会走向社会的失序与野蛮。因此,对权威和自治的理解和应用,都不能脱离历史现实将二者割裂开来,片面地、孤立地或是极端地谈论任何一方,都将会动摇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

二、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一些 损害党中央权威的消极和负面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因政党本质属性的内生权威与政党领导效力的外生权威而得以牢固树立。但随着社会全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因对人民赋予权力兑现的应然状态与效力未满的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诸多损害党中央权威的消极和负面因素。

(一) 多元价值冲突下理论权威阐释力趋弱

理论权威是政党权威在思想领域的呈现,也是政党权威走向大众的必然选择,政党权威的确立与维护依赖理论权威对思想秩序的维系。当理论与群众紧密结合、思想秩序得以确立时,政党权威就会牢固树立;当理论与群众脱离、社会意识分化时,政党权威就会出现危机。对于巩固和稳定政治权威而言,意识形态具有表达功能和指导功能,一是通过话语和思想的传达来契合群众的愿望和诉求,促使群众信任和支持政治权威;二是通过思想指导和引领,促使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实践,获得自身所求和所需,从而主动向政治权威靠近。基于此,执政党亟须加强和提升主导意识形态对思想领域的引领和指导,避免因异端思想的分化而导

致社会思想在“离经叛道”中走向极端化,最终导致政治失序、政权更迭。

多元价值冲突下理论权威阐释力趋弱对政党权威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解构政党权威的理论之基与解释政党执政话语不足两个层面上。其一,从解构政党权威的理论基础方面来看,现实中有两股思想力量,一是国外资本主义社会思潮的涌入和渗透;二是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沉渣泛起。这两大主要力量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诽谤、污蔑等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不断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传播、吹捧,其背离合法性社会规则的意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因而容易迷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权威认同悄无声息地予以解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解释政党执政话语不足。多元价值冲突下,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问题和群众诉求的回应缺乏即时性的有力说服和解释,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得以有机会走向群众,不仅造成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和选择的混乱,而且极大地影响到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将会引发对政党执政的质疑和不信任。“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6](P84)}因此,多元价值冲突下,当理论权威趋弱与大众思想缺乏统一秩序耦合时,理论权威的动摇势必会给政党权威带来巨大威胁和挑战。

(二) 多元社会中利益诉求的分化考验着政党权威

多元社会中利益诉求的分化呼吁政党权威的高效能力。利益分化预示着一个社会整体中存在着多元且不交融的利益群体、组织或阶层。利益分化反映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对统一政治权威的分解,因此,政治权威必须具备整合、协调多元利益诉求的能力,否则,政党的权威性自辩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由一元转变成多元,新的阶层不断涌现,由此而来的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和变迁。因此,为满足各个阶层在不同领域的愿望和需求,政党权威形式也必须不断转换以适应现实变化,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能,缓和并消除因社会变革、利益冲突而带来的

动摇政党权威的不利因素。

多元社会的利益诉求对政党执政效力的期许考验着政党权威。一方面产生了群众向党中央聚合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因“责任”超载与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而形成党中央权威的潜在危机。在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日益凸显,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党轮流执政而导致政策执行经常性中断的弊端,实现了党委领导下的高度负责和履职机制。但也面临着能否及时消化和吸收多元利益诉求的压力,因为,一旦出现某一利益群体的声音没有得到及时回应,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失误、失灵等现象,党组织就会成为第一“责任人”,必然会影响到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波及党中央权威。因此,在分析政党权威所担负责任的基础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制度优势的效能转化能力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

(三)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降低政党威信

腐败现象是消蚀政党权威资源的最大蛀虫,也是割裂党群关系的利刃。中国共产政党权威得以牢固确立并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党性的外在表现要依靠全体共产党员的承载与践行。党员干部违反和背离党的性质的一切行为,都将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损害党的形象、降低党的权威。

权威自利与权力寻租是权威体制的一大弊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根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渐建立起了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严密、系统、稳定的体制机制。但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而言,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长,人们对资本和利益的追逐不可避免,反映到党内,就是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因理想信念缺失而腐化堕落的现象。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7]“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8](P4)当前,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利欲熏心,借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之机,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囊中塞满了从群众手中攫取的财富和利益,极

大地损害了群众对党的情感和信任,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虽然从现实来看,腐败现象并不是某一政治建制中的特殊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对政党私利的建党价值惯性依赖,选择了超脱政党私利的人民至上的党性价值遵循,因此,党员干部借公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的。

三、《论权威》对当代 中国共产政党权威的启示

维护和巩固党中央权威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面对当前社会领域所呈现的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负面因素,我们有必要深刻解读《论权威》中对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集中表达,来重新审视权威何以重要,深刻理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积极引入法治权威、实现政党与法治的良性互动,以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

(一)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

综观历史和现实,权威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建设、发展或改革中愈来愈凸显其价值和作用。权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威的作用范围也必将不断扩大。正如恩格斯所说,“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3](P226)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时间轴线上是连续性和持续性的,在空间范围上是全方位的、全领域的,现代化作为党执政以来的发展主题,为党中央权威的确立和稳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法性资源支持。同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以维系思想秩序和实践秩序,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时空统一;以执政为民的政治规范、制度动机、价值遵循,确保人民意志转化为人民利益。

综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首先,在历史与现实的耦合中,党中央权威提供了现代化强国建设所需要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等社会因素。中国是在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基础上建设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拥有良好的传统领导权威的思想积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了良好的领导革命和执政形象记录,成为党中央权威获得信度资源的稳定供给。而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更需要党中央权威通过施展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实现群众意志的现实转化。在《论权威》中,论及权威的存在条件时,恩格斯发出这样的提问:“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3](P275)}答案显然是后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虽然社会环境因现代化因素的加入而与单纯的政治权威所需的环境产生巨大差异,但复杂的、宏大的社会变革更需要党中央权威来统一方向和目标,以免走向纷争、撕扯等混乱的发展闹剧。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所以不能效仿西方国家政党交替式的执政模式,是因为若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能够始终代表人民意志的领导核心,施政制度将会失去其韧性,朝令夕改总是上演,人民群众将始终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何谈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其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党中央权威提供源源不断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机制。《论权威》中恩格斯对权威的作用和功能的阐释,是今天我们以政党为领导核心进行组织生产、协调利益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思想理论指导。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首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竞争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实现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目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发挥政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持社会稳定、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动员、协调矛盾、化解冲突对抗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要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权威在统治、决策层面上主要体现于组织整体的统一意志,在组织、领导层面则主要体现在一个政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人上,即组织的领袖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既体现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又体现为领袖个人在全党的核心地位。领袖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甚至领袖权威事关一个政党组织

的整体权威。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党中央权威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在《论权威》中,恩格斯运用船只大海航行的故事形象地表达了个人权威的重要价值,“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3](P276)}尤其是对于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组织来说,没有一个核心的领袖人物或领导者,非但组织内部无法意见一致,导致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而且会因争执而延迟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导致国家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人民需求无法及时满足,这时民众对政党的失望情绪就会激增,必然会引起自下而上对政权威的不满和反抗。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工人革命时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9](P286)}也正是因为有列宁这位伟大的政治领袖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说的:“一个团体就其规模来说越大,它越不可能直接由自己从事政治性事务,而是必须把责任和权力放到其他人的手中。这就需要能把那些另外的人挑选出来,并且带有更大程度的可能性来保证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将被作为合法的而予以接受。”^{[10](P178)}显然,伊斯顿所说的“那些另外的人”,在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层面讲,其实就是指领袖人物。我们党的历史传统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年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11]当然,领袖的核心地位并不代表可以搞个人崇拜,必须坚决杜绝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盲目个人崇拜。马克思在写给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5](P524)}新时代,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同一切损害党中央权威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坚定不移地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标看齐,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决定于党的性质,又来源于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活动。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3](P274-275)}中国共产党因其广泛的代表性,成为中国一切联合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维护人民意志作为党的权威意志的政党,并且形成了培育每一个党员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对人民负责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严格的制度约束机制。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坚决维护人民意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纵观我们党近百年建党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很好坚持的时候,党和国家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遭受严重挫折。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2](P15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初心使命的担当,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越来越凸显其优势和力量。当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以极强的回应机制及程序化机制,恰当和充分利用在党中央权威领导下所形成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既在顶层设计、群策群力上集中全党智慧,达成高度一致的共识,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在执行过程中避免出现争议混乱、政令不通、执行不力的状况,进而形成良好的治理格局。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与法治权威的规约相统一

现代化转型在政治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须以法治权威嵌入政治权威,为政治权威提供稳定的、持续的法治保障。法治权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权威的内在规定,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及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与自治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偏废其一。这里权威与自治不仅是指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而且内含着对权威的制约和监督思想。在现代国家中,人民对政党权威的服从不仅来自于政党自身的领导力

和治理能力所转化的效能,还来自于法治对政党自身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否有效,即当代政党权威必须是政治权威和法治权威的统一。

建立一个政治权威和法治权威统一的国家权力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的内在规定,也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其一,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本质上含有法治、法治国家等思想,法治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3](P260)}“任何人,甚至最优秀的立法者也不应该使他个人凌驾于他的法律之上。”^{[13](P26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绝不是反权威主义者所反对的那样是专制的、没有自由可言的对权力的绝对服从。正如蒋清华对这一关系的解释:“作为与人治相对的法治,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事先制定的规则的意志、权威与统治者的意志、权威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统治者应当服从于规则。”^[14]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早已蕴含在中国的治国之策中。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法治权威与政治权威双维结合的重要表现,这表示执政党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法治的笼子里,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通过法治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畅通了人民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渠道。其二,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传统型权威模式走向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法治权威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法治权威必须以党中央权威为根本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15](P96)}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奠定了维护和巩

固党中央权威的现实基础。当前,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公平、更加正义的法治建设已在路上,但目前法治建设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法治制度建设不健全不完善、法治思维不凸显等不足之处,因此,须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建设,加强政党权威的法理嵌入,以确保党中央权威能够始终以人民的意志为出发点和目标旨归行使权力。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9-01-1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巴枯宁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7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N].人民日报,2016-11-03(5).
[1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蒋清华.论法治的基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2):45-54.
[15]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Firmly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Engels' s *On Authority*

HONG Xiang-hua, ZHANG Y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P.C. is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nation's awakening, rising and taking-off.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authoritative thoughts contained in Engels' s *On Authority* are still the theoretical blueprint for understanding authority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y and obedience,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our times. At present, issues such as the conflict of multiple values, the difference of interests, and the breeding of corruption within the Party caused by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have created a crisis of trust and identity for Party authority.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existence of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we must return to the Marxist authority thought to re-examine the importance of authority,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ore essence of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new era, actively introduce the rule of law authority, and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cientific and legal foundations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Key Words: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ower; obedience; autonomy; “two safeguard”

责任编辑:傅建芬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刘 仓¹, 杨 璐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102)

摘要: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基于家、国、团体兴衰现象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问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历史周期率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和使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合二为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开辟出航道。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的课题。从根本上说,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伴随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战略举措和成功实践。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锻炼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率;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26-10

一、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提出 和中国共产党的接续探索

(一)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提出及其升级

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总结家、国、团体兴衰提出的历史问题。1945年7月,毛泽东询问黄炎培访问延安做何感想。黄炎培说,六十多年他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管是个人、家族、国家、团体,“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P148-149)]

后人把“历史周期率”称作“黄炎培难题”;把毛、黄的谈话称为“窑洞对”。

历史周期率难题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是漫长的艰苦的历史过程。从世界革命进程来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新制度取代旧制度,难免会出现复辟和反复辟、倒退和反倒退斗争的局面。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能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四个达到”,完成社会革命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课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而复失,则意味着没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若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收稿日期:2019-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

作者简介: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杨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合二为一,两个课题成为互逆命题。

(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艰辛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经济社会建设,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精神基础;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和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和推进国家统一。完成这些任务,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而要彻底完成社会革命,还要进行各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复杂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要求“进京赶考”,考出好成绩,表示“决不当李自成”。这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做了思想上、精神和心理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为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做出艰辛的探索,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2](P297)}

二是“在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是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力。从根本上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3](P252-253)}这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高度概括。

三是加强党的建设工程,发挥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要求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针对苏联产生特权阶层和高薪阶层现象,提出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历史课题。保持党群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社会革命的力量源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反对“和平演变”,使人民政权牢牢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反对官僚主义这个妨碍社会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刘少奇说:“总是搞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必搞成人民和官僚

主义集团的矛盾,直到这种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上层建筑。”^{[4](P222-223)}反对腐败,是党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表现。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现象不除,“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5](P417)}

历史表明,跳出历史周期率同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相统一,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联系,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相融合,同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相一致。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教训来看待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应该从社会主义事业进程来警惕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伟大历史进程的科学总结。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接续探索

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的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的成果,借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把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事关党执政使命和中国道路前进方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许多场合直接强调“历史周期率”问题,有的场合借用“霸王别姬”“人亡政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等用语来表述。从根本上说,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结合在一起,同党的性质宗旨、使命结合在一起,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腐化变质能力结合在一起。只要党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就不能说是彻底跳出了历史周期率。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些都是习近平长期思考的问题。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牢记“赶考”使命和“两个务必”精神,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6](P701)}跳出历史周期率同“四个伟大”相向而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逐渐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其政治保证。伟大事业有什么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就要有什么部署。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强党有道。这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要求,也是实现党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战略举措。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解决党长期执政问题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在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懈怠。党的建设同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党的历史使命尚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更为紧迫。如果党内信念涣散、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那就无法凝聚党的战斗力,无法战胜各种风险和考验,无法实现奋斗目标和完成历史使命,甚至严重脱离群众,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本领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6](P80)}。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路径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于社会革命全过程,贯穿于党执政为民全过程。王岐山讲道:“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7]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思想建设从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二是管党从严,增强“四个意识”,做

到“两个维护”,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三是执纪从严,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全党牢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①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四是治吏从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优化选人用人环境。五是作风建设从严,坚持以上率下,改进党风政风。六是反腐倡廉从严,惩治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特别是清除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腐败分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8](P453)}这些都是事关党的性质的基本问题,如果哪个方面出了短板,就有可能形成木桶效应,给党和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目的在于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习近平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9](P6)}全面从严治党是须臾不可松懈的自我革命,体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试出了人心向背,增强了党的生命力战斗力,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党长期执政课题取得阶段性成功。

(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

革命的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若丧失理想信念,共产党就丧失了灵魂,所谓社会主义也就迷失方向。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P80)}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之所以浴火重生、百炼成钢,归根到底在于有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

理想信念是抵御错误思潮进攻的精髓和灵魂。由于权力寻租等影响,一些党员存在理想信念动摇问题。“四风问题”之所以盛行,党员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滑

^①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是“五个必须”。(《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第1版)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讲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强调:“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是“七个有之”。(《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页。)

向犯罪的深渊,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若干问题,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蜕化变质,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严重扭曲。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10](P326)}如果高级干部患上软骨病,放弃党的领导,失去理想信念,那怎么能在各种斗争中坚持中国道路呢?那党、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高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全党理想信念就会坚如磐石。

理想信念是抵御西方腐朽思想进攻的精神防线。干部失去理想信念,无异于自己放弃思想阵地,将为西方思想意识入侵打开闸门。有的甘愿做洋奴,盲目崇拜西方制度,以西方模式为标杆挑剔中国制度。有的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模糊,模棱两可。导致这些思想问题的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习近平尖锐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0](P327)}如果背离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列宁和斯大林思想体系,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强调:“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10](P326)}理想信念动摇将带来严重政治危害。习近平警告说:“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8](P347)}如果哪天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共产党的干部能否毅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做出肯定回答,但字里行间透漏出隐忧和担心。

坚定理想信念,关键是加强理论学习。习近平指出:“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11](P67)}占领科学理论制高点,才能占据人类理想制高点,才能占领道义制高点。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经地义。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道路,形成中国理论,确立中国制度,发展中国文化,都源于这个理

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道路的统帅和灵魂。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避免“霸王别姬”的战略举措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管党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做起。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抓住了这个点,我们党就能更好凝心聚魂、强身健体。”^[12]

总的来说,党内政治生活具有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同时也存在大量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有的高级干部放弃理想信念,忘记性质宗旨,脱离组织和群众;有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严重;有的公权私用、行贿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特别是党内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揽权名利,无法无天。这些问题,严重败坏党的声誉,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长此以往,党和国家难免面临是否改变颜色问题,也将套上历史周期率的魔咒。习近平告诫说:“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我说过的‘霸王别姬’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了。”^{[13](P6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解决好突出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大力整治“四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铲除最致命的“污染源”;立规矩,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笼子,使各项纪律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防止“破窗效应”。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12项内容作出规定,既指出病症,也开出药方;既有治标举措,又有治本方略;把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党员干部按照准则和各项规定办事。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实践证明,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是巩固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路径,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制胜法宝,是党员干部锻炼党性的炼金炉。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11](P37)}

(三)使各项纪律和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纪律严明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强有力的特有优势。习近平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6](P131)}

中共十八大以来,总的来说,全党执行纪律是好的。但也存在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现象。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无组织纪律观念;有的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只斩不奏;有的政治野心膨胀,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后要进八宝山”。有的对其主政地方建立“独立王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组织纪律松弛成为党的一大忧患。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应上升到党纪国法来处理。“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仅恶化政治生态,更会严重损害党心民心。”^{[11](P114)}

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11](P111)}严明党的纪律,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习近平指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11](P116)}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政治路线是“王道”,党的纪律是“霸道”。如果政治纪律形同虚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准则、政策、部署失去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加强纪律建设,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体制,构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若干党内法规为结构的制度体系,让制度和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201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有指导思想、原则和适应范围,违纪与纪律处分,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对违法犯

罪党员的纪律处分,对违反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等纪律的处分等做出明确规定。《条例》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党内法规,是严明党的纪律的红线、底线和高压线。

(四)以刮骨疗毒精神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腐败是党执政面临的巨大威胁,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和特权现象,这对党群关系最具有杀伤力。“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是社会的毒瘤。腐败问题往往和政治问题相伴而生,严重的会形成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反腐败,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涉及党和国家权力归属导向问题。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如果特权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甚至将导致国家性质是否改变颜色问题。严重腐败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怨声载道、社会动乱、政权垮台。中国历史上因统治集团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有的执政党因腐败而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习近平告诫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6](P81)}

中共十八大以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实施天网猎狐行动,加大国际追逃力度,推动G20、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使腐败分子无所藏身、无所遁形。中共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有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14](P137-138)}清除党内的害群之马,对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意义。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那将会失信于民,陷于塔西佗陷阱。反对腐败不能松懈,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勇气反对腐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4](P53-54)}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关党的性质和宗旨问题,事关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必须持之以恒。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做到依法用权、为民用权,作人民的公仆,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15]

(五)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最大优势是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基。党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加强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围绕党同群众的联系,厚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作出表率,正人先正己。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密切党群关系,永葆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党的历史任务。比如,“四风”的严重后果,是浪费资源,延误工作,疏远人民,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四风”问题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根源。

党的作风建设也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11](P49)}习近平在考察西柏坡时表示:“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

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16]根据新的实践,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努力营造“六又”政治局面。党的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导致不良作风不断反弹、愈演愈烈,百姓的希望会变成绝望。党的十九大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度强调正风肃纪课题,把作风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联系起来,以期发挥整体效应,把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贯彻到底。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体察人心向背的风向标。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不会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

(一)自我革命是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了,新中国成立70年了,党在全国执政也70年了。这在世界政党史上已经创造了历史奇迹。但从大历史观来看,共产主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党的历史也有从完成阶段性任务到达到最终目标的长期过程。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成功不等于永远成功。必须把最高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统一起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7]

当今大的历史时代,仍处于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时代,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竞争和合作,是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行百里者半九十,船到中流浪更急,更需要警惕精神懈怠、政怠宦成、求荣取辱、半途而废的教训,更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社会革命进程未有穷期,党的自我革命也无休止符。

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8]

在新时代，党面临的执政环境越加复杂多变，各种考验和危险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只有自我解剖，才能对症下药；只有自我完善，才能自我提升。解决长期执政问题和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P355)}

(二)党的自我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之道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幼年到成熟，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根本原因在于守初心、担使命，坚定不移朝着奋斗目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向何处去的初衷，不能丧失了继续革命的精神。习近平告诫说：“背离了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做不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19]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建设的历史课题。这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定海神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具有自我革命精神。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根源在于党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结合，以自我革命精神革除自身病症，推动社会革命不断前进。如果丧失自我革新的动力，党将陷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险境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

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20]自我革命是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根本途径。

党的自我革命是永葆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炼金炉，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金刚钻，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治党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设成为经过各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7]

通过自我革命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既要形成整体态势，也要把住关键重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8个方面突出问题，^①都是可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阻碍伟大事业前进的问题，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这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指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说一千道一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做好了这件事，中国共产党就能长期执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19]

(三)政治建设是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建设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21]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强身健体、脱胎换骨的成长升华，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的基本途径，是保持党的阶级性质、完成历史使命的基本建设。党

^① 即：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的问题，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出问题，层层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甚至充当保护伞的问题。《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开展专项整治作出部署安排》，《人民日报》2019年7月18日第1版。

的政治建设是自我革命的内容和灵魂,党的自我革命是政治建设的路径和目的,二者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解决长期执政使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基层党组织,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并不容易。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 and 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22]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一些政治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有的忽视政治、淡化政治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四个意识”不强,有的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模糊党的政治方向,影响党的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政治属性,侵蚀党的政治基础,消解党的政治生命。习近平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23]

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21]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推进党的政治任务,巩固党的政治根基,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加强党的建设总体要求,对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组织实施等问题作出规定。^[22]《意见》是指导党的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通过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破解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党的权力的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举措。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监督不力、监督不够、监督不到位,甚至监督缺失等问题。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不规范,是管党治党失之宽松软的制度因素。习近平说: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如果把监督当成挑剔,或者当成摆设,就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有了

失误、犯了错误也浑然不知,那是十分危险的。”^{[11](P204)}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是永葆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内生动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权力滥用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滥用会导致绝对腐败。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缺乏监督,容易带来违法乱纪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一窝式、一串式腐败。习近平指出:“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8](P461)}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主体缺位、监督责任缺失、监督工作缺乏等问题,充分发挥监督制度的优势和效力,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转变为严紧硬。王岐山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7]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推动党内监督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改进纪检监察体制,推动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问责、巡视工作、党内监督等条例,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如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8](P461)}党内监督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证。习近平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8](P461)}

人民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保证。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增强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同时发挥人民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他监督的作用。习近平强调:“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24](P53-54)}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决定党的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执政党应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让人民监督党的权力运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党的根基才能坚如磐石。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

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5](P57)}

(五)通过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破解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执掌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政治和本领都要过硬。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18]从整体上看,同党和国家发展要求相比,党的执政能力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全面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本领,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建设。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目标越高,任务越重,风险越大,考验越严,越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部署,要求增强学习本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增强改革创新本领,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形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群众工作本领,率领群众干事业;增强狠抓落实本领,求真务实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工作主动权。^[14]只有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才能领导经济社会建设,抵御各种风险,战胜各种困难,胜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关键是抓好少数领导干部。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18]这“五个过硬”,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方面。

解决社会问题和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统一的。只有解决党自身的问题,才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只有解决了社会问题,才表示执政能力的提高,才算实现了自我革命。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之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守正出新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提升,才能推动伟大事业不断前进,不断由现实的此岸驶向美好的彼岸。

参考文献:

- [1] 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7]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N].人民日报,2017-11-07(2).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2016-06-30(1).
- [13]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N].光明日报,2015-06-28(1).
- [16] 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1).
- [17]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全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9-06-26(1).
- [18]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

- 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1).
- [19] 杜尚泽,张晓松.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N].人民日报,2019-07-18(1).
- [20]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06-15(1).
- [21]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J].求是,2019(14):4-9.
- [2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02-28(1).
- [23] 姜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1).
- [24]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The Successful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in the New Era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LIU Cang¹, YANG Lu²

(1.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f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is a historical problem that Huang Yanpei raised to Mao Zedong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y, country and group. As far 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oncerned,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is connected with the struggle of two classes, two roads and two social systems. The posi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are combined with the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Mao Zedong as its core, has opened up a channel to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and realizing long-term governance are the topic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s to explore in the new era. Fundamentally speaking, jumping out of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ycle rate is accompanied by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four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s a strategic measure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for the party to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in the new era. Advancing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with the spirit of self revolution, preserving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f the Party and exercising the Party as a strong Marx political party is the radical solution to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Key Words: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ical cycle rate; strictly govern the Party; self-revolution

责任编辑:彭 澜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 传承发展与现实启示

杨 昕¹, 张荣臣²

(1.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22;

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与历史进步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核心密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品质,更是今后能否破解长期执政历史性难题的关键密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民族危亡、忧人民解放、忧党的生存,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表现为忧患怎么为中国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长期执政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36-08

中国共产党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比任何政党都怀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忧患。换句话说,正是在近代以来中国深陷严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在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无比强烈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搞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动力,更是今后能否破解长期执政历史性难题的关键密钥。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 重要的精神品质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强烈忧患意识的指引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实现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辉煌成就。

(一)忧患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具有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P1)}。党的先锋队性质,一方面决定了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这就要求全党要始终坚决彻底地依靠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强调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收稿日期:2019-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18AKS002);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2019dfdxkt052)

作者简介:杨昕,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基层党组织建设;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

的代表,要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实践的全部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是人民的立场,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边,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先锋队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都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对苍生大众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忧患。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满怀忧患、勇负重任,才成为中国人民谋求独立解放和强盛繁荣的主心骨,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二)忧患意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自身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满怀着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国是一幅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剥削的积贫积弱景象,普通大众的生活处于极度悲惨的境地,急需一支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力量来领导中国人民走出这种困境。若是没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可能自觉地投身到中国革命的事业中去,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正确的政治主张,压迫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也就不可能被彻底推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停止奋进的脚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曲折探索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事业,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正在稳步实现之中。

(三)具体表现为忧国、忧民、忧党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忧国,根本是忧民,关键是忧党。其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满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强烈责任感。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乾坤裂未补,簪笏达何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的继承,是面对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一种强烈危机感。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忧国意识,中国共产党人才不怕牺牲、顽强斗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批又一批敌对力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断跨越。由忧国而及忧全人类,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一方面中国的独立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的支

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全人类共同进步作贡献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其二,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心向背问题,正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为事业成功的根本。在强烈忧民意识的指引下,牢记为民初心,强化宗旨意识,一刻不停地为增加人民福祉而努力。其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自身建设。无论是在艰苦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中,还是在取得全国执政的地位后,都始终怀有管党治党的强烈忧患,并将之内化为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积极应对矛盾风险,坚决清除腐败流毒。在党的建设具体实践中,相继提出“伟大工程”、“两个务必”、“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思想论断,使党始终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 历史传承与发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忧,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忧,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而忧,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之前忧患意识的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怎么为广大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便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主要表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由领导革命到执政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

(一)革命战争年代的忧患: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近代中国深处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民族已经到了危亡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对民族危亡、人民解放以及党的生存无比强烈的忧患。

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2](P386)},旗帜鲜明主张“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

团结为国”^{[2](P383)}。即使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依然提醒“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3](P1031-1032)}。为此,必须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建立起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中国。面对国内政治统治的腐朽和黑暗,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4](P47)}的情形,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刻都不能放松反抗。尤其在抗战胜利之际,他提醒“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5](P1126)},必须坚决斗争、不怕牺牲,彻底推翻反动黑暗的独裁统治。面对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多重压迫和剥削之下贫苦大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的悲惨生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处其中、历历在目、无比忧心。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就详细描述光是寻乌一地就有约四成的农民过着“禾头根下毛饭吃”^{[2](P204)}的生活,刘少奇则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6](P394)}。面对长期敌强我弱的斗争局面,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认清革命形势,认识到革命斗争时刻充满着艰辛和挑战,稍有不慎,革命的前途就有被葬送的危险,特别是对“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3](P948)}。为了全面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7](P602)}的马列主义政党。

(二)执政之初的忧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使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无论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还是党的自身情况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如何为全国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5](P1438)}。他告诫全党一定要对执政有本领恐慌,要好好地学习和掌握各种执政本领,希望共产党进京赶考能够考出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特别是随着全国执政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

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P1083)},但也“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5](P1427)}。他特别强调一定要认认真真向一切内行学习经济工作,“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5](P1481)},不能够摆架子,更不能不学不问、不懂装懂。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忧心执政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P1439)}。针对执政后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不仅加大惩处力度,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对此,毛泽东指出党“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8](P28)},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时刻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三)改革开放后的忧患:“发展才是硬道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忧患反映。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反思“文革”十年动乱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挫折和损失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0世纪70年代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日益巨大的中外差距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必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9](P242)}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首先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先进性决定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10](P266)}。世界各国都在搞现代化,而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此,他特别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0](P267-268)}同时,他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0](P268)}、“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0](P271)}。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事业,党要担负起领导重任,就必须“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9](P314)},必须努力改善党

的领导。对此,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制度建党的新思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和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使党内生活制度化。

(四)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的忧患:“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并且创造性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比忧患的重大问题。江泽民特别强调:“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11](P601)}他明确提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江泽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一切事业的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坚强领导。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搞好市场经济,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增进人民福祉。他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2](P517)},特别是搞市场经济,广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在新的实践中积累新经验、掌握新知识、增加新本领。与此同时,面对苏联和东欧剧变和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江泽民忧心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执政党内部出了问题,因此失去了民心。他要求全党务必高度重视人心向背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要高度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面对不正之风和各种腐败,他强调“一切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都应坚决克服”^{[12](P291)},要对一切腐败始终坚持高压严惩,特别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做到廉洁从政,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五)十六大之后的忧患:“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进入到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忧患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胡锦涛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居安思

危,增强忧患意识”^{[13](P658)},特别是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14](P534)}。

针对发展模式不科学,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胡锦涛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既要看重经济增长又要看重发展质量,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又要重视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进行,他强调“之所以要突出讲忧患意识,是因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充分的准备”^{[14](P19)},必须“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13](P613)}。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性的根本任务来抓,不断提高党应对各种执政风险的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走向成熟。

(六)十八大之后的忧患:“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认真接好历史的传接棒,努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我們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2014年4月15日,他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5]2014年6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16](P155)},必须深刻认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16](P155)}。

习近平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重要论述突出的特点,一是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高度强调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7](P1)}。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为人民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时刻牢记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攻坚克难,努力破解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是从新时代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高度强调忧患意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风险和挑战绝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少。这就要求全体共产党人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科学判断、积极预防、有效应对,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不断取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三是从长期执政高度强调忧患意识。目标越远大,使命越光荣,我们党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直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要从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只有始终从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出发,树立底线思维,坚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18],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来中国人民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的悲壮与不屈,凝结着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的革命与奋斗,凝结着新中国成立70

年的建设与改革,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特别是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利益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格局。因此,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成为必然,要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全面”,强调改革不是一个或几个方面、领域,而是指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谓“深化”,强调改革不是浮游于表面或到哪一层面就适可而止,而是要不断向纵深推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做深做实,努力把绘就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二)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3](P62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要求要知行合一,敢于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突破遏制、回应挑战、补齐短板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7](P8)}。但是,事业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伟大时代要有伟大斗争,伟大斗争必须依靠斗争精神。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克服任何形式的骄傲自满和消极怠慢,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主动破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风浪挑战,认真践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五个更加自觉”,攻坚克难,不断争取新胜利。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人心向背事关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赋予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一切对人民群众负责,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进入新时代,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一是始终心系人民。是人民选择了党,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只有时时心里装着人民,处处为人民谋求利益和幸福,党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继续执政。反之,就会被人民抛弃,丧失执政地位。实践中,全体党员都要端正思想观念,敬畏人民,自觉做好人民的仆人。二是一切为了人民。在具体工作中,每个党员都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最高追求,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在定规划、做决策时,必须尊重民意,做到一切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对群众负责。不断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发展社会事业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紧紧依靠人民。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要拜人民为师,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有意识地融入群众中去,汲取营养、增强力量。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认真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热心服务群众。坚定依靠人民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取得改革发展的新突破。坚持不懈改进作风,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

(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严管党治党,是应对执政风险,战胜各种挑战,完成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必将更加复杂,执政考验也必将更

多更大,很多旧问题仍有反弹的可能,很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必须以更加严明的纪律和规范,以更加从严从实的作风,多管齐下抓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要治出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的目标。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不正常现象,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政治局面。就党组织而言,就是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注重提拔重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对那些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干部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要激浊扬清,坚决铲除腐败这颗毒瘤,下大力气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让歪风邪气在党内无所遁形。就党员个人而言,就是通过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优良传统深入到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认真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反对和破除一切党内“潜规则”,绝不搞人身依附、拉帮结派那一套,绝不搞任何形式的小圈子、小码头,更不能穷奢极欲、贪赃枉法。

(五)坚持底线思维,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

执政考验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考验实质上是如何长期执政的考验。因此,必须从应对执政风险的角度思考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就必须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擅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任何共产党人都必须筑牢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常补精神之钙,确保党性纯而又纯。针对各种错误思潮,必须增强政治定力,敢于斗争亮剑,特别是坚决堵住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泛滥的口子,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颠覆性错误。

二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反对存在一切形式的宗派组织和宗派活动。党的历史证明,任何形式的宗派组织和宗派活动实质上起着瓦解党的破坏作用。要治

理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要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维护党中央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体现在“两个维护”上。党的十九大党章提出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P10)},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指出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P4-5)}。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坚定对党的信念,强化党的意识,始终忠诚于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令行禁止。

三是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不断提高自身应对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看到我国长期处在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改革发展的任务不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少,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迈进深水区,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破解。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这样只会导致社会出现不同的“利益范围”,使得整个社会离心离德,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凝聚到实现改革发展的全社会共同利益上来,全力破解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难题,不断实现各个发展阶段的任务目标。另一方面,要看到世界从来都不是太平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定会带来既得利益大国的激烈反弹,大国之间的竞争将会愈加强烈,中国也永远不会摆脱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问题,领土和主权安全问题,周边安全问题都将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和预防措施,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必须以更加宽广的历史和世界眼光,冷静分析,科学判断,博采众长,在为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同时,维护和实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品质。正是时刻饱含着对国家、对民

族、对人民无比强烈的忧患,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畏牺牲、披荆斩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实现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着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成就。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唯有从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增强执政本领,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顺利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3]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4]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5]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 [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8]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1).
- [19]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4-15.
- [20]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Hardship Consciousness

YANG Xin¹, ZHANG Rong-chen²

(1.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Anhu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Hefei 230022, China; 2.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product of the dramatic changes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eadership co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ver more than 90 years, the C.P.C. has been able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one great victory after another. The strong hardship consciousness is the core code. The hardship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quality of the C.P.C, and it is the key to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difficulties of long-term governanc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s hardship consciousnes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rying about the nation's peril, worrying abou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worrying about the survival of the Par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more manifested as a worry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government and take power for the people, and how to make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to revive the 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P.C. must regard long-term governance as a strategy, always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ways prepare for a great struggle with many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firmly grasp the people's heart, the biggest politics, and push the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managing the Party and developing in depth, and consistently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danger and prevent risk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rdship consciousness; long-term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彭 澜

身份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实践逻辑之新视角

张欣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党的领导核心引领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发展。新时代对于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要转换视角,以党员为主体,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的角度分析党员的心理因素,揭示党员的心理与维护行为的关系。维护的逻辑起点是通过教育手段使党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更加清晰,有了自我身份的清醒界定。逻辑衔接点是通过内部的推动力与外部拉动力对党员情感进行调动。逻辑落脚点是党员有了身份自觉,与自上而下的维护要求同向共力,有力的维护领导核心。这种由内而外的维护逻辑更坚定、持久,有助于党的团结稳定和党的事业发展。

关键词:身份自觉;领导核心维护;认知—情感—意动理论;维护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44-06

一、前言

政党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领导核心^①的引领与组织。因此,对领导核心的维护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要求,也是“党的利益所在,应该高于一切,绝不应破坏”^{[1](P287)}。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发展中充分体现出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决定党的方向、立场和成就的关键,甚至影响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说过:“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核心地位,形成并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后党的事业才能峰回路转并顺利推进。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的核心,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党的十九大后强调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这不仅是当前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中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大变革,国际竞争激烈,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化。变化催生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领导核心,对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也需要向前推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阐释

以往对党的领导核心维护研究的逻辑起点是领导核心的内涵:领导核心在微观层面既指总书记的职位也指总书记个人(吴家庆,2017)。逻辑衔接点是领导核心的重要性:历代领导集体都需要一个核心,否则这个集体是靠不住的,强调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优势。从党本身来讲,领导核心是领导

^①关于政党的领导核心一般包含两层内涵:第一层是该政党有一个内部的领导集体,是政党的核心;第二层是该政党领导集体里的“一把手”,也就是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本文提到的领导核心是指的第二层意思。

收稿日期:2019-11-27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中观研究范式的集体领导制理论与实践创新实证研究”(18BZZ068)

作者简介:张欣,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

集体的中坚力量和稳定发展的关键和保证(孙继虎, 2009),是全面从严治党,促使党焕发活力的关键(王陈, 2018);对国家和社会来讲是应对国际挑战和破解国内矛盾的需要(宗芳, 2017),在引领中国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道路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石小娇, 2017)。因此,逻辑落脚点是要求党员必须维护党的领导核心。首先,思想上要增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与总书记始终保持一致(张书林, 2017);其次,行动上要紧跟步伐,以中央要求为指南,看行动,见担当(柳礼泉, 2017);最后,要注意理性维护,不“跑偏走调”,不盲目地热捧,更不能陷入“个人崇拜”(金民卿, 2016)。并以苏共作为反例,讲述苏共正是因为丧失领导核心导致亡党亡国,起到警示作用(戴辉礼, 2017)。总之,目前大多数此类研究都是针对要求维护领导核心的思维而单独展开的,逻辑过程是从概念开始,从重要性递进,以维护路径结束。关注的焦点是维护的形式和方式方法,却忽略对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主体——党员的研究。党员是一个有主观意识的个体,自主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党员可以自主选择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规则。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从党员出发,分析党员的心理因素,揭示党员的心理与维护行为的关系,而不只是简单地自上而下遵守维护的要求。只有维护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党员内心真正的认同,而不是建立在受到外在刺激或者要求的情况下被动地维护,因为刺激或要求一旦消失,维护的行为也就会结束。这样党员才能产生身份自觉,主动自下而上地去维护,个体内部的情感是有巨大成长力量的“种子”,所以由内向外的维护逻辑则更坚定、持久。由此,以心理学中认识产生的三维框架认知—情感—意动理论^[3]为切入点,探究党员的心理过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党员对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

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认知、情感和意动是描述个体内部心理活动的三个维度,也被称为“心灵三部曲”。通过研究“个体的内部心理活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造物理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4]以理解心智活动的本质,分析个体成长与发展过程。这三个阶段是个体对事物认识最普遍、最一般的过程,党员的行为也是如此。所以,一方面要理解这个过程具有普遍性,只要是个体都必然经历,而且是无意识的行为,要有方向

和目标的引导。另一方面,党员作为有“身份”、有社会“角色”的个体有不同于一般民众的特点,必须在引导中要着重加强行为自觉的导向。可见,对党员的引导是否得当,会对党员的行为是否达到要求产生重要影响,在党的领导核心维护问题上也不例外。党员的行为必然会经历认知、情感和意动三个阶段,认知阶段是对意识产生和知识获得过程的描述,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系统,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推理决策等^[5]。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进行认知,是对事物的判断,情感难辨不稳定,一般都是将情感列为不同程度事物情绪的反应,并伴随强烈的身体运动表象的心理状态^[6]。意志行为活动一般是以潜意识的、随意的、能动的形式出现,侧重于从行为效应的角度进行认知,是关于“怎么办”的认识,可以说意志是将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行为的动力^[7]。根据这三个阶段党员维护领导核心的心理过程就非常明晰,从这个过程来思考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逻辑。

三、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逻辑

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实践首先诉诸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内涵与重要性知识的传授来实现党员此方面的认知发展,其次培植党员对党、对党的领导核心的情感,最后通过党员的自觉行为在实践中维护领导核心。完成从逻辑起点到逻辑衔接点,最后到逻辑落脚点的维护逻辑。

(一)逻辑起点:党员的身份自知

党员在认知层面就是对党的了解,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使命与责任,促进党员在此方面认知的发展,是让党员能够通过思考,拥有对中国共产党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对党的热爱、忠诚,党员建立起对党的情感依恋,才能促使党员有使命、有担当的行为的实现。因此,党员对党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是不完整的,要进一步深入到情感的层面,清晰党员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促使党员在情感基础上的意动,也就是维护行动。所以党员的身份自知是其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逻辑起点。

身份自知就是党员要从价值层面上认识自己,要有以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身份来面对和服务社会的意识,把对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理解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表现为三个标准:一是党员认识到自己是党员,并不是普通群众;二是党员意识到自己的崇高责任和担当;三是意识到自己哪些行为是合格的,哪些行为是需改进的。

党员要能够实现身份的自知,对党员的教育是一条必经之路。因为思想觉悟并非天生,党员对党的认知、对党员身份的认知并不会在入党后能够自然保持,尤其是现在传媒信息“短平快”“抓眼球”的特征下,很有可能跟从感官欲望迷失了党性。就需要通过学习、通过实践来感悟,找回丢失的“初心”。所以,党员教育就是一个帮党员找“心”的过程。如何教育:第一步明确党员教育的地位与中心内容。毛泽东就曾专门提到过教育是“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对党员进行教育亦成为党内一个优良传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8]把教育放到了一个首要的位置上,党员理论与品格教育并重。有了定位之后,党员教育的第二步是注意教育要具有科学性、合规律性:教育的方式要遵循认知的规律,从感性认识开始,由感觉、知觉等表象的内容上升到理性认识,最后到实践,然后再认识再实践,形成一个循环过程。不能就原理讲原理,就概念讲概念,比如在讲党性修养的时候就不能只讲党性修养是什么,党的历史上是多么重视党性修养,而是要从发现问题开始,启发党员主动思考,因为党员是教育的主体,必须让党员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定义。有了分析的过程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党员教育的第三步是要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传统的教育形式可以分为日常教育和集中教育,关于日常教育有专门的《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通过党员的集体学习、党员过组织生活和个人自学等方式高质量地把全体党员轮训一遍。还包括举办政治仪式来熏染党员的情感,因为仪式展示的内容不仅渗透着情感,更能把价值赋予到参与者的体验中。此外,运用新媒体手段,如“学习强国”“党员小书包”的累计学时或者积分来量化

对党员的日常教育。对于集中教育,目前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还有已经结束的三次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是从不同的着重点对党员教育。主题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和管理规定学习的节奏和重复的周期,让党员自评、检查和评比,同时进行引导和鼓励,当然也有纪律的监督。党员经过这一次系统的学习,在讨论学习心得时用得较多的一个词语是“洗礼”,也就是思想政治的洗礼,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问题,以及“两个维护”的重要性。

通过教育手段使党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更加清晰,有了自我身份的清醒界定。明白“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思考曾经自己为什么要入党?自己所加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在入党时我的誓言是什么?自己现在的行为和曾经的诺言相一致吗?这些自知便是能够自觉主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逻辑起点。

(二)逻辑衔接点: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对党员情感的调动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个体情感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自身,一方面来自于环境。根据此理论理解党员对党的情感的产生与深化,一种是党员个体对归属感的需要,加入党组织被认可被认同,这是来自于内心的推动力。另一种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外部的拉动力。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党员有了身份认知之后,就产生了精神渴求,对党的感情也从入党时浮于表面,或者有其他动机而转变为对党真正的热爱,在党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有了崇高的信仰和追求,爱自己选择的中国共产党,并以此为荣。于是,党员就会希望党越来越好,情感得到了升华,有了用自己的方式对党组织的维护、对党的领导核心维护的推动力。比如在小的方面,不觉得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政治任务;在大的方面坚决与抹黑党的行为做斗争。除了这种自发产生的情感以外,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的拉动力是情感产生的重要力量,从宏观层面看,党的全面领导下,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时间里,“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国家繁荣强大，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国家责任感得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赞誉，塑造了新时代良好的国家形象，甚至被以色列学者称为“中国重新定义了发展”。人民幸福，真正享受上了发展的成果，从吃穿住行到精神生活都是富足的。不仅有幸福感，更有安全感，安全的社会秩序，有保障、有盼头的生活。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新篇章。党员作为这个国家执政党中的一分子自然有一份责任感，有一份使命感，这种热爱是一种感情，是对自己所在执政党的自豪。从中观层面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也是成果丰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就向纵深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都逐步向前推进。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就处理党员干部9.7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9万人，“打虎”“拍蝇”坚决与腐败问题做斗争。同时，党有自我革命的勇气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自己，没有第二人。”因此，面对问题毫不避讳，对党组织和党员身上的问题敢于不留情面地把问题晒到阳光下。党员素质的提高、信念的坚定使整个党组织内部充满积极向上的能量，党员在组织中有归属感、有使命感和有责任感，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也相应提高，党组织自身能力和形象的提升使党员对自己组织的感情更为深厚，这也是一种拉动力。从微观层面看，党的领导核心的领袖品质对党员情感的影响至关重要。情感具有感染性，党的领导核心的言行会给党内营造一种风气，引导一种方式。如习近平总书记回答了意大利众议长的问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领袖，您是怎么想的”，习近平的回答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不只是习近平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没有小我、夙夜在公、“不负人民”的赤子之情。他的从政之路始于梁家河，时任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时就积极解决人民群众的饮水问题、农具问题、用火问题等，赢得了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习近平更是严格要求自己，担当起这个大国领导人的责

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的领袖，这样的榜样有力地调动了党员的情感。“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之下被给予——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9](P263)}，多位参与阅兵的党员回想起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那一刻都说激动的泪水打湿了自己的眼眶，辛苦的训练过程也完全值得了，确实这种感觉的激发作用远远超出了其他力量，而且具有持久性。可见，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个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领导核心在情感拉动方面抵得上千军万马。

综上，党员在对党情感升华后会产生强有力的内部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与外部环境对党员情感的拉动力一结合，尤其是领导核心的自身人格魅力吸引和带动下的拉动力。这两种力对情感的调动就是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实践的逻辑衔接点，在这个基础上情感才能真正转变为意动，有力地维护领导核心。

(三)逻辑落脚点：党员的身份自觉与自上而下的维护要求同向共力

意动关注的是情感产生之后应该“怎么办”，是意识和动机的一种耦合，也就是党员在有了身份自知和厚植了对党的感情后开始自觉维护领导核心，这种自觉行为与自上而下的维护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发力，就是维护好了党的领导核心。党员的意动也就是具体维护的行为亦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是党员本身要维护应该怎么做？另一方面是面对党的要求，党员应该如何去做？

党员要立足本职，主动学习党的理论，提高工作能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一种行为，行为的好与不好、成功或不成功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而能力来自于理论、实践以及自我思考总结。党员要提高能力就要学习党的理论，毛泽东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本依据”，习近平也专门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也是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员对理论的学习必须扎实，学深悟透和融会贯通，需要注意的是要尽量学习原著，不要被别人分析的第二手材料所阐释的价值观所影响，还要注意不能把原理生搬硬套地运用，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党员把党的理论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敬业、勤业、精业、乐业，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业绩，工作能力的提高，再加

上情感上对领导核心的认同,才能提升对领导核心维护的能力和定力。

要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服从。情感的升华、政治上的认同最终都会体现到服从的行为上,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被支配者要服从支配者声称所具有的权威。政党也是一样的,党员要服从领导核心、服从权威也是政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但这种服从是不强制性的服从,是建立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的行动,是经过缜密思考后自愿的、自主的、自发的,是积极和褒义的。党内服从最早提出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方面的服从就是党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被传袭下来。进入新时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嫁接上网络的技术和覆盖范围,政治环境又相对活跃,党员通过各种途径接收政治信息,又通过各种方式被进行党内教育,形成了对领导核心的情感和政治认同,这是较为抽象的,所以党员的服从应该具体明细化,不能只是当作一个口号去强调。如何服从呢?思想上把服从自己的上级领导作为行为准绳,党是有组织的,肯定是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领导,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以“四个服从”为基础,在具体的工作和行为中服从自己的上级领导,也就是服从组织。比如,组织派你去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组织派你去做困难的工作,这时候就不能挑三拣四、挑肥拣瘦,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要以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然,服从不是“盲从”,在遇到决策与实践有出入时可以逐级反映情况,尽快补救。此外,服从不是简单的“听从命令”,“而是更强调自主创新下的独特贡献与业绩”^[10]。组织安排党员在一个岗位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不可能只是要一个听话的人,这样没有任何意义,组织想要的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出创新、做出贡献的人。所以,所谓服从服从的是组织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在岗位上干出自己的特色,让组织放心。

党员能力的提高和坚定的服从,是党员的主观意识下和党的要求下,同向共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行为,也是在认知—情感—意动理论下分析党员心理因素和维护行为的逻辑落脚点。认知、情感和意动三个

方面既是单向递进的关系,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员的认知情感影响了行为,主动维护行为又会深化认知和情感。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将会不断推进对党的领导核心的维护。

四、结 语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政党的成败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核心,领导核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是党能否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不只是中国,世界上任何政党都对自己的领袖有维护的意识,而党员是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主体,没有主体维护意识的自觉形成,维护行为就可能会“打折”,党员对自己身份有了认知后,在自身情感的推动力和外在情感感染的拉动力下,同向共力地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这种更持久、更坚定的维护力量将不断推动着党的事业的前进。

参考文献:

- [1] 李延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人民日报社论.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7-10-26(6).
- [3] Rosenberg, M J, Hovland C I.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Components of Attitudes [M]. Hovland C I and Rosenberg MJ (Eds.), 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An Analysis of Consistency among Attitude Compone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1-15.
- [4] CLEGG C.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udy of cognition in organizations [J]. British of Journal Psychology, 1994(3):27-36.
- [5] 刘向阳,张程程,彭小丰.基于认知意动视角的心态调整模型构建[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9):195-198.
- [6] Hsee CK, Kunreuther HC. The Affection Effect in Insurance Decisions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00,20(2):141-159.
- [7] Reitan R M, Wolfson D. Conat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J]. Archives of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2000,15(5):443-453.

- [8]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1-6.
- [9] 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0] 丛林.行政组织中领导干部交流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1.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afeguar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re

ZHANG Xin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leading core of the Party leads th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re needs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taking the Party members as the main body, analyzing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Party memb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gnition-emotion-motivation theory, and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members' psychology and maintenance behavior.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maintenance is to make the Party members' cognition of their "identity" clearer and ha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ir own identity by means of education. The logical connection point is to mobilize the emotion of Party members throug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tus. The logical foothold is that the Party members have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work together with the top-down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and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core of leadership. This kind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intenance logic is more firm and lasting,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cause.

Key Words: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maintenanc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re; cognition-emotion-motivation theory; maintenance logic

责任编辑:彭 澜

雄安新区引领下的 河北主动、创新发展研究

刘 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系统工程,河北的发展至为关键。河北必须依托雄安新区,克服自身弱点,借助雄安新区的辐射引领,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发展,塑造河北成为京津冀联动发展的重要一极。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河北在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挖掘雄安新区发展对河北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以及引领河北创新的路径,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雄安新区;河北;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50-07

一、引言

2014年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相应的各方面研究工作也在逐步深入推进,从初期的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河北承接产业转移,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逐步转向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加速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为龙头,从而实现京津冀以创新为基础的协同发展。

创新是协同的基础,京津冀三地的创新水平,河北处于显著劣势,虽然河北近年来整体区域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但区域创新能力在东部地区乃至全国排名都比较靠后,特别是与北京、天津相比,差距非常大。如果京津冀创新能力不平衡的二元格局无法改变,河北与京津两地的差距可能再次拉大,就会严重影响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1](P13)}。

将雄安新区建成创新发展引领区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大步骤,对三地一体化的要素集聚和资源合理配置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可以引领带动河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拓展京津冀区域发展空间,打造全球创新高地^{[2](P1)}。显然,努力实现河北创新能力大幅度的提升,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2019年1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让京津冀地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3]。总书记的指示,为京津冀联动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系统工程,河北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加速塑造成为京津冀联动发展的重要一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仅要实现雄安新区和京津的协同,更重要的是,通过雄安新区这一世界级的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彻底解决河北发展的短板,从

收稿日期: 2019-08-1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项目“雄安新区引领下河北主动、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 刘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而实现河北总体和京津的协同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指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系统推进有利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努力构建市场机制高效、主体活力强劲的经济体系^[4]。以指导意见为引领,加速雄安新区发展,推进区域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聚集和扩散,带动河北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缩小同京津在创新方面的落差,是河北加速发展的关键步骤。

二、河北创新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表 1 2017年河北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和全国其他地区对比

	GDP占全国百分比(%)		R&D经费内部支出占全国百分比(%)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内部支出/GDP)		河北数值/相应地区
	数值	排序	数值	排序	数值	排序	
北京	3.31	12	8.97	4	5.64	1	.24
上海	3.62	11	6.85	6	3.93	2	.34
江苏	10.14	2	12.84	2	2.63	3	.51
广东	10.59	1	13.31	1	2.61	4	.51
天津	2.19	18	2.61	14	2.47	5	.54
浙江	6.11	4	7.19	5	2.45	6	.54
山东	8.57	3	9.96	3	2.41	7	.55
陕西	2.59	15	2.62	13	2.10	8	.63
安徽	3.19	13	3.21	11	2.09	9	.64
湖北	4.19	7	3.98	7	1.97	10	.68
重庆	2.29	17	2.07	17	1.88	11	.71
辽宁	2.76	14	2.44	16	1.84	12	.72
四川	4.37	6	3.62	8	1.72	13	.77
福建	3.80	10	3.08	12	1.69	14	.79
湖南	4.00	9	3.23	10	1.68	15	.79
河北	4.02	8	2.57	15	1.33	16	1.00

资料来源:根据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

(二)高质量人才稀缺形成创新质量洼地

高质量创新资源的多寡和质量,对创新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表2中看到,2017年,河北研究与开发机构R&D人员在全国所占百分比为2.26%,在全国排第13位,落后GDP所占百分比排位5位。但从高端人才占R&D人员百分比看,则十分匮

(一)R&D投入不足为创新发展关键短板^{[5](P8)}

R&D支出份额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持续性,近年来河北省虽然R&D投入不断增加,但投入强度仍然相对较低。从表1可以看到,2017年河北GDP排序为全国第8位,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在全国排位仅为第15位。R&D支出同GDP之比仅为1.33%,在全国仅排在第16位,仅为北京的四分之一弱,天津的二分之一强,上海的三分之一强,东部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的二分之一强,也低于中西部的陕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区。河北在全国处于科技投入洼地,直接影响了国家创新要素在河北省的投入,也难以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相关高新技术企业聚集,成为河北创新发展的关键短板。

乏,博士占R&D人员百分比仅为7.35%,在全国排26位,硕士占比为34.04%,全国排第18位,博士和硕士相加占比,则排全国第26位,这一数值,不仅小于京津、沿海省市以及小于长江流域地区,甚至小于绝大部分经济落后省份,显然,河北的R&D人员质量不高。无论从区域角度还是从全国范围看,属于典型的人才洼

地。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河北的投融资环境,对于创新要素聚集,高技术产业落地,引入高质量项目及其产业化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表 2 2017年全国各地区R&D人员中博硕士占比

	研究与开发机构R&D人员占全国百分比(%)		硕士博士占所在地区R&D人员百分比(%)					
			博士		硕士		博士+硕士	
	占比	排序	占比	排序	占比	排序	占比	排序
北京	25.84	1	29.59	1	35.94	12	65.53	1
江苏	6.14	5	15.14	14	42.53	2	57.68	2
湖北	3.21	9	16.64	13	40.88	3	57.52	3
福建	1.23	22	18.94	10	37.77	6	56.71	4
浙江	2.07	14	19.26	9	37.30	8	56.56	5
安徽	2.64	12	21.88	4	32.98	22	54.85	6
新疆	.95	25	18.33	12	36.49	11	54.82	7
上海	7.10	3	18.76	11	35.63	14	54.39	8
青海	.25	29	24.98	2	29.20	29	54.18	9
广东	3.82	6	19.85	7	33.88	19	53.73	10
甘肃	1.63	18	22.90	3	30.68	25	53.58	11
辽宁	3.55	7	14.49	15	38.94	5	53.42	12
山东	3.16	10	20.36	6	33.05	21	53.41	13
吉林	1.92	15	21.58	5	31.62	23	53.21	14
宁夏	.15	30	6.46	27	44.76	1	51.22	15
黑龙江	1.62	19	9.54	20	40.72	4	50.27	16
海南	.49	28	19.49	8	29.72	27	49.21	17
山西	1.22	23	9.20	21	37.74	7	46.94	18
四川	8.62	2	10.21	19	35.74	13	45.95	19
贵州	.87	26	11.84	17	33.36	20	45.20	20
广西	1.12	24	8.35	23	35.13	16	43.48	21
湖南	1.70	17	8.10	24	35.07	17	43.18	22
河南	3.22	8	6.18	29	36.77	10	42.94	23
云南	1.85	16	13.31	16	29.59	28	42.91	24
重庆	1.29	21	11.57	18	30.05	26	41.62	25
河北	2.26	13	7.35	26	34.04	18	41.39	26
陕西	6.95	4	6.18	28	35.15	15	41.33	27
西藏	.11	31	3.82	31	36.90	9	40.73	28
天津	2.86	11	7.65	25	31.40	24	39.05	29
内蒙古	.82	27	8.47	22	27.32	30	35.79	30
江西	1.35	20	5.46	30	25.52	31	30.98	31

资料来源:同表1。(表中数字只保留两位小数)

(三)政府投入未能形成对科技创新的有效引导
河北不仅R&D投入强度相对较弱,而且政府在科

技创新投入方面亦严重不足,根据计算,R&D资金中来自于政府的比重2017年仅为15.04%,同全国平均

19.81%的水平有较大差距,全国各省级单位中仅排第20位,低于河北的仅有11个地区,这11个地区中,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5个省属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机制发达,企业和科研单位经济实力强,融资渠道广泛,研发投入来源多样化,政府投入较低,并不影响技术创新,并且政府投入虽然占比低,但总量高,对创新的推进作用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对于经济发展落后,且创新能力较弱的河北地区而言,企业自身筹集资金搞研发的能力本身就十分有限,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对培植、促进企业创

新十分不利。

(四)创新资源集中孤立分布限制了创新行为扩散

河北省人数有限的创新人员和创新经费,在地域上和产业上分布高度集中,区域分布不平衡显著。据统计(见表3),2016年,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四个市占据了河北省创新人员占64.77%,创新平台经费筹集的66.85%;四个市中石家庄为省会,其他三个市基本都是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创新资源在地域和产业上的高度集中,对发展新型产业的创新和创新的扩散设置了障碍。

表3 河北创新资源分布状况

	河北省科技创新平台人员按地域分布 单位:人				河北省科技创新平台经费筹集按地域分布 单位:万元				b/a
	总人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经费筹集总额(a)		其中:政府资金(b)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合计	28549	100.00	17571	100.00	1320308.82	100.00	163778.74	100.00	12.40
石家庄	8704	30.49	5161	29.37	317496.13	24.05	66168.39	40.40	20.84
唐山	3089	10.82	1839	10.47	174510.33	13.22	8269.48	5.05	4.74
秦皇岛	2225	7.79	1152	6.56	72792.47	5.51	13248.66	8.09	18.20
邯郸	2654	9.30	2332	13.27	52069.39	3.94	5392.75	3.29	10.36
邢台	2057	7.21	1176	6.69	100293.19	7.60	3460.18	2.11	3.45
保定	4043	14.16	2098	11.94	338486.72	25.64	25221.82	15.40	7.45
张家口	598	2.09	507	2.89	17910.39	1.36	2198.80	1.34	12.28
承德	904	3.17	662	3.77	98724.9	7.48	5393.80	3.29	5.46
沧州	1105	3.87	819	4.66	29906.83	2.27	1726.69	1.05	5.77
廊坊	1459	5.11	868	4.94	75852.02	5.75	25327.07	15.46	33.39
衡水	1046	3.66	601	3.42	29123.23	2.21	1389.2	.85	4.77
辛集	54	.19	54	.31	1459.5	.11	0	.00	.00
定州
天津(河北工业大学)	611	2.14	302	1.72	11683.72	.88	5981.9	3.65	51.20

资料来源:根据《河北省科技创新平台综合统计年报(2016年)》提供的数据计算。(占比只保留两位小数,合计与各占比之和有偏差)

三、雄安新区对河北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

(一)显著提升河北的科技创新活力

科技和人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地区经济的快速腾飞一定有着众多优秀人才的支撑。河北经济的落后,一方面源自于多年来对传统产业和传统增长

方式的依赖,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京津对创新要素的虹吸,导致河北省高端创新要素的流失,创新环境不佳,新技术新产业难于在河北落户。雄安新区建设,打造创新高地,改变高水平要素的聚集方向,通过培育教育、交通、医疗等高端服务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平台、孵化器,使河北省内有了可以和京津并肩的创新中心,增强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创新有了立足点,通过在雄

安的积累、转化,然后再将创新成果向河北全面辐射,对于提升整个河北的创新活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加速河北产业结构升级

多年来,河北以能源原材料、钢铁、装备制造、重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有限的创新资源和人才等也集中在这些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必须打破原有产业所形成的人才、资源束缚,为此,河北的产业结构升级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迈进,另一方面包括以创新为依托,培育新型产业。如果说传统产业由低向高的迈进,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逐步实现,那么新型产业的发展则必须通过引入新的创新资源、新技术、新产业,打破原有的人才、资源布局,才能实现。雄安新区在这方面所起的推进作用,无可替代。

(三)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开辟新空间

京津冀虽然地理位置邻近,但综合实力的差距,决定了京津冀三者关系中,河北处于劣势地位,缺乏承载高技术产业的实力,缺乏新型产业的产业链,在三地的合作中,往往处于低端产业的流入区。

根据李兴光等(2018)研究,京津冀三地中,北京市2016年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三位,其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几个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北京市在经济发展、知识和技术积累、人力资本优势、区域政策等的优势使其创新能力远高于其他省市^{[1](P12-13)}。天津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也处于领先的地位,天津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产业发展先导区、创新主体集聚区、开放创新示范区和转型升级引领区,使得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区域环境、国际化程度得到全面提升。通过动态趋势分析,河北省从科技投入到创新产出的效率均比较低,产学研深度融合欠缺,新兴产业亟待拓展,技术创新能力需要提升。整体区域创新能力在东部地区乃至全国排名都比较靠后,特别是与北京、天津相比,差距非常大。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河北省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有所改善,技术转移能力有显著提升,但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加快雄安新区的建设,使河北的科技创新有了新的立足点、新的高地、新的窗口,完善优化京津冀三地创新资源布局,是解决长期困扰河北的创新资源不足、创新能力低问题的唯

一途径。在雄安新区抢占科技创新能力制高点的同时,大力推动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创新资源的有序流动,打造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链,使河北首次实现了能够有资格和京津并列的平等地位,为河北的持续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天地。

(四)河北绿色发展的关键之笔

长期以来,能源原材料等高耗能产业的粗放增长模式,使河北形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产业发展的惯性,形成了环保和增长之间的矛盾,雄安新区建设,为河北的环保设立了新的标准和新的动力,为河北的增长找出了新的路径。首先,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发展绿色生产,解决重化工业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危害,逐步解决一直以来由“三高”所引起的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系列问题。其次,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新型产业,彻底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间的良性互动。

(五)为河北体制创新提供驱动力

市场化程度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是河北省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以雄安创新为契机,且以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摆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为抓手,通过打通制度、市场、创新三者之间的通道,激发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同时对涉及创新发展的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改革,达到深化体制改革的目标。

四、雄安新区引领河北创新发展的路径

雄安新区引领河北创新发展的路径,要紧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京津冀城市群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以此为指导,在雄安新区引领下河北的创新路径要遵循以下几点。

(一)聚创新要素

将雄安新区建成世界级创新中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步骤,通过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将强力改变京津冀三地中河北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模式。雄安新区设立前,河北由于毗邻京津以及产业

结构的制约,多年来创新资源外流严重,要么流入京津,要么流入南方,在本地人才本不富裕的状况下,人才进一步净流出成为制约河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的建立,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将极大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破传统的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方向与分布格局。通过建立雄安特色的创新优势,必将极大改变河北省人才外流的状况,通过聚集高层次的创新要素,使创新要素和区域发展相匹配,进而带动和挖掘河北经济社会的创新潜力,并形成跨越式的发展,以此形成京津冀三方各自的竞争优势,进而形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要素合理流动的发展态势。

(二)创产业优势

只有河北的经济加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河北要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敢于发展高端产业。以雄安新区世界级创新高地为龙头,通过吸引创新要素向雄安聚集,带动、加速新型产业发展,改变河北以传统产业如钢铁、建材、煤炭等传统的高耗能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低端第三产业为主的落后产业结构,打破原有产业发展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形成河北新的竞争优势,重塑河北的产业格局。

雄安新区的发展从产业来讲,是要打造一个高新产业的集聚地,并以此激发河北省科技创新的内生力,通过外部要素的加入,比如人才、项目等,加速河北发展。雄安不但自身发展,还要担负起引领孵化河北高科技产业,引领河北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在雄安的引领下,河北第二产业发展要突出创新要素、突出科技含量,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改变以往突出低端的发展模式,增加科教、金融等高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而实现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三)建创新体系

作为传统发展模式为主导的河北,创新活动不具备系统性,官产学研的紧密联合机制尚未形成,构建从上至下的各个层级的区域创新体系,将创新活动纳入创新体系之中,至关重要。

产业的创新发展,不能单纯地看作仅仅是企业自身生产手段、生产装备、生产体系的更新,而应将创新发展纳入体系之中加以考虑。创新发展是持续的技术、经济和制度的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

支持。要突出政府和创新中的作用,通过制定促进产学研更好地结合等相关政策,构建起一套紧密的官产学研联结机制,发挥大学作为创新源头的重要作用,为科研院所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创新动力。

(四)育区域活力

河北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区域上表现为,各城市各自为战,区域间产业链不完善,产业缺乏互补性,城市之间通过产业协作的交流较少,科技资源的交流也少,中心城市和周边的产业链联系较少。建立雄安新区,通过创新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分配,为实现创新资源的合理聚集和辐射,实现平等的区域分工,成为和京津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高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雄安位于河北省地理位置的中部,建立和京津相应的创新高地,从区位上辐射南北,为形成产业在区域上的梯次配置,活跃要素的传导,在河北内部改变省内发展不均衡,减少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从全国来看,通过创新发展,可以逐步改变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落差,实现河北省的跨越式发展。

五、政策措施

(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加速建设创新河北

一是要加快创新体系建设。不仅是雄安新区的创新体系建设,还要包括整个河北省各级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当前应重点完善省级和市一级的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体系建设,调动科研院所、区域、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发挥带动就业、支撑创新作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全省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快高端要素落地雄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使产业疏解效应最大化。把创新雄安作为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同时加速雄安河北的联动发展,充分利用京津高科技产业疏解,加速京津现有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落地雄安,积极规划、建立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优先在雄安新区布局,支持雄安新区企业联合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共建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产业创新中心,联合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在此基础上,河北省有条件的地区应联合雄安建立科技园区,

形成创新平台的梯次配备,将产业疏解的效应最大化,将河北建设成雄安高端产业、高端研发的扩散区,高端服务业的配套区、服务区。

(二)提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加大政府和创新领域的投入,特别是对重大项目要持续加大投入,对项目的发展要起到主导作用,通过对多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项目的支持,带动河北创新的发展。为此,首先,要确定一批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作为政府投入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带动力。其次,切实提高R&D投入占GDP的比重,争取在几年时间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第三,制定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和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三)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努力推进雄安科技创新对河北的辐射效应,各地应建立雄安产业配套园区,通过产业链的形式,形成雄安产业高端发展和产业园配套发展的模式,将河北产业配套效应最大化,带动河北区域均衡发展。

(四)以全方位开放推进河北跨越发展

借助雄安建设全球创新高地的东风,实施全方位的开放,不仅要和京津合作,而且要通过提供优质的创新环境,面向全国、全世界开放,全方位吸收资金、科研机构、人才、成果,形成雄安的特色优势,进而将创新成果向全省乃至全国辐射。

(五)统筹规划现代教育体系建设

持续推进雄安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把雄安新区引进京津及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作为雄安新区和河北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支撑。为在京高校和知名科研院所整体搬迁或设立分支机构创造有利条件,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雄安新区办学,以新机制、新模式组建雄安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服务于科研的公共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和世界级创新中心相符合的现代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 [1] 李兴光,王玉荣,周海娟.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动态变化分析——基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09—2016)》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8(2):9-16.
- [2] 武义青,柳天恩,窦丽琛.建设雄安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17(3):1-5.
- [3] 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18/c1024-30577648.html.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24/c_1124038513.htm.
- [5] 颜廷标.区域特质视角下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选择——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论坛,2018(7):6-11.

Research on the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ong'an New Area

LIU Ka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 system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ajor system engineering project, Hebei's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plays a key role. Hebei must rely on Xiong'an New Area, overcome its own weaknesses, with the help of Xiong'an New Area radiation guidance, improve its innovation ability, accelerate it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make Hebei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ole of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Hebei'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ully explores the key role of Xiong'an New Area development in Hebei'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ath leading Hebei's innovation. Finally, the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Xiong'an New Area; Hebei Province;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赵哲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

梁军峰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政治学教研室, 江苏 扬州 225007)

摘要: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的基本态势,但同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影响政治安全的不利因素日趋复杂。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有针对性的防范打击,坚决消除一切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

关键词: 政治安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57-06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的基本态势,但也要看到,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影响政治安全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多、日趋复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深刻总结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特征和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在发展规律,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P200)}这是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2]在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安全。2017年1月12日,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安全,归根到底都是以政治安全为基本前提。

收稿日期: 2019-09-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14BKS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梁军峰,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之后的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伟大斗争”,意在告诫全党同志:“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

社会发展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习近平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4]当今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矛盾尖锐性、局面复杂性、形势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越发展就越会遭受世界上那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嫉妒与作梗,就越会遭受国际反华势力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仇恨与破坏。现在个别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进行遏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与一切否定、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坚决与一切诋毁、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坚决与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作斗争,持续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自强梦和发展梦,必须要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发展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安全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

轮,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只有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特别是创造和谐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的梦,是合作共赢的梦,它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同时也将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在30%以上。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梦持认可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但同时,面对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国际社会也有一些曲解和误读、疑虑和猜忌,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将中国梦曲解为“扩张梦”“强权梦”,甚至是“霸权梦”,一定会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坚定地向世界宣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5]同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坚定地表达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6]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政治安全是头等大事。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政治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打断的危险。

二、当前我国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保持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不确定性显著增多。我国在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日益复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

(一) 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挑起“颜色革命”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个别发达国家认定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对其全球霸权的挑战,在难以使用武力手段征服的情况下,开始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干扰破坏和渗透颠覆,甚至图谋发动“颜色革命”。从外部看,他们对我国实施围堵,推动我国周边安全问题持续发酵,以期在我国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包围圈。从内部看,他们对我国实施渗透,插手干涉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等事务,利用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策反我国人员和窃取国家秘密,扶植利用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媒体、智库以及各种敌对势力从事与我国法律不相符的活动;他们以民族、人权等问题为幌子,推动各种所谓“社会运动”,以“宗教自由”为名对我国实施宗教渗透;他们推动所谓“文化冷战”“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国拔根去魂,把人民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他们利用互联网加剧对我国的渗透破坏,炮制恶性政治谣言,制造大量负面舆论,混淆视听,抹黑中国。现在,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很容易使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一般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

(二) 分裂主义活动对国家主权安全的挑战

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分裂主义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内容。对存在分裂主义的国家来说,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根据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7]根据分裂活动的主体与分裂活动的驱动因素不同,分裂主义可以划分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政治分裂主义。

我国受分裂主义威胁较为严重,存在多股分裂势力,对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严峻挑战,这使得反分裂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之一。从类型上来说,“疆独”和“藏独”属于民族分裂主义,他们以宗教、文化差异为基础,与境外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勾结串通,公开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企图通过民族对抗

谋求民族独立。“台独”和“港独”属于政治分裂主义。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政局变动,“台独”势力为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制造了诸多障碍,台海局势趋于复杂严峻。“港独”势力近年来也比较活跃,表面看来是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学生通过“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实质却是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香港“占中”事件爆发以后,一些西方媒体可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香港“占中”是一次“颜色革命”。尽管“占中”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港独”势力不会善罢甘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港独”势力将会持续挑起社会矛盾、制造政治分歧和煽动意识形态对立,以此挑战中央对香港的制度部署。

(三) 暴力恐怖活动对社会稳定大局的破坏

从境外情况看,“伊斯兰国”虽遭重创,但其人员和思想双重外溢,大量恐怖分子向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扩散,已经在我国周边地区形成恐怖动荡之弧。“东伊运”等“东突”恐怖势力依托国际恐怖组织快速发展,无论是能力还是影响力都在提升,对我国的威胁也在增大,其潜回境内实施暴恐活动的目的明确、意愿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海外利益向安全风险高危区延伸,与国际恐怖势力正面交锋的可能性在增大。2016年8月30日,一辆携带炸弹的汽车冲进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并在馆区内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使馆3名人员轻伤。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通报,恐怖袭击的主谋哈利洛夫为恐怖组织“东伊运”成员。2018年8月11日,中冶集团山达克铜金矿项目员工在巴基斯坦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11月23日,我国驻卡拉奇领事馆遇袭,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从境内情况看,一些地区暴恐极端活动的生存土壤依然存在,仍有暴力恐怖分子潜藏蛰伏,暗中织网布局,伺机制造事端。2013年6月26日凌晨,新疆鄯善县小镇鲁克沁地区发生骚乱,多名暴徒手持砍刀袭击鄯善县公安局,造成27人遇害。在被残杀的人员中有妇女,还有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乡亲。暴力恐怖分子在境内外反动势力唆使下肆意挑起骚乱,残杀无辜民众,目的无非是想扰乱日常生活秩序,破坏新疆社会稳定,进而分裂祖国。同时,还有一些暴力恐怖分子形成“伊

吉拉特”^①团伙向内地转移,以打工、做生意等方式筹集资金,分散潜伏,伺机出境。部分暴力恐怖分子已不仅仅将内地作为落脚、藏匿、中转地,而是选择就地“圣战”,内地面临的暴恐威胁更加现实、直接。

(四)政治腐败是国家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隐患

腐败是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重大威胁。腐败不只是侵吞人民的财富,破坏人民的利益,更为恶劣的是,它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破坏党群关系,严重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当前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一些腐败分子为了保住并攫取更大经济利益,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诉求,搞团团伙伙、小圈子,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王岐山指出,“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重要方面就是,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8]

反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苍蝇”虽小,危害不小;“蝇贪”成群,其害如“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大多以“潜规则”和“小毛病”的面目出现,这种腐败问题,被称之为“微腐败”。“微腐败”的涉案金额不一定很大,但量大面广,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极大败坏了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蜕变为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使基层政权完全异化变质,成为黑恶势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严重削弱了基层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对党的领导和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决不可等闲视之。

三、切实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

古人云:“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有政治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政治风险麻木不仁。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有针对性的防范打击,坚决消除一切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

(一)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9](P438-4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路径,我们必须坚定“四个自信”,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绝不能回归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就难以凝聚磅礴的力量,就会四分五裂,难以战胜国内国际重大政治风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是一句空话。坚持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的内涵是特定的,维护核心只能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级党组织,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随意延伸。“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

^① 伊吉拉特,本意为“迁徙”。它源于伊斯兰教历史上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信徒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创建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的这次迁徙活动被称为“伊吉拉特”,标志着伊斯兰教由宣传教义阶段过渡到组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阶段。“伊吉拉特”在近代发生了歪曲变种,完全背离了它原本的意义,被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作为组建团伙、蛊惑人心、实施暴恐的手段。

宝贵政治经验,是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

(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方式。习近平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10](P85)} 2018年3月10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法治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必须有法可依。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握立法时机,加快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间谍法、关于修改军事设施保护法的决定;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反恐主义法;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防交通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网络安全法;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情报法、核安全法、测绘法(修订);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等。与此同时,各地方、各有关方面也要抓紧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国家安全法律的配套规定,力争到2020年基本形成一套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时代特点,内容协调、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

(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国家安全忧患意识,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不断提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11](P334)} 所谓底线思维,是指对事物的发展要客观地认识,立足防范最坏情形的出现,努力争取最理想的结果。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天下并不太平”这个现实,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保持风险意识,及时发现矛盾和问题,争取把它解决在萌芽时期,防止矛盾传导、升级、叠加、演变,最终酿成政治风险,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安全。

防范“颜色革命”风险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复杂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始终绷紧政治风险这根弦,坚决打击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要加强专业情报机构和群众性信息队伍建设,建立便捷的组织机制,及时掌握外部势力渗透、勾连、利用和策反情报,提前预警,及时反制。要健全国家安全立法,依法监控国防研发,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有产权变更、跨境资金流动、境内合作交流等各种敏感行为,坚决清除一切颠覆势力的在华组织、基地和渠道。要开展积极有效的外交工作,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相关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稳步构建抵御“颜色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国内,要重点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叠加共振,着力防范境外向境内的“倒灌效应”,严密防范各种安全风险集聚交汇形成风险综合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大舆论引导和舆情管控力度,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防止矛盾升级演变,防止外部势力插手利用。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和希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杨大志.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N].解放军报,2018-04-20(7).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4]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
[5]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7] 杨恕,李捷.论中国反分裂主义战略[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3):60-73.
[8]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N].人民日报,2017-11-07.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in the Political Field

LIANG Jun-feng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Party School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Yangzhou 225007,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afeguarding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t present, China's 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has generally maintained a stable and positive basic situ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are unprecedented, and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affecting political securit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We must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enhance our sense of urgency,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trengthen targeted preventive strikes, resolutely eliminate all hidden dangers affect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nsure the Party's ruling security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olitical security; bottom line thinking;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责任编辑:刘 博

基于NVivo的基层机构编制 监管信息化质性研究

王飞¹, 刘步先², 梁坤¹

(1.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2.河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深化改革进程中有效运用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有利于有序落实改革方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开展机构编制监管工作,应采取台账电子化管理、云平台建设、善用社交媒体、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互联网+监督管理”常态化、加强队伍建设等路径,提升综合监管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共享;编码分析;NVivo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63-06

一、研究背景

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制度层面对机构编制工作进行了细化,为各地区各部门顺利开展机构编制工作提供了依据。《条例》多次提到信息平台与信息共享,彰显了机构编制工作信息化的重要性,为“互联网+”时代的机构编制工作,尤其是机构编制监管指明了方向。

(一)研究综述

机构编制监管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环节。通常在国家层面上,各国都有相对健全的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如美国由隶属于总统办事机构的联邦劳动关系局、功绩制保护委员会和人事管理办公室三个部门统一负责政府编制管理工作,英国专设管理和人事局,法国设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日本设隶属总理大臣管理的编制管理部门^[1]。机构编制经费与政府财政预算挂钩,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要求编制人数与经费预算同时上报,议会讨论通过后必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方面,日本的《国家行政组织法》为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机构编制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机构编制监管工作还处在发展阶段,国内关于机构编制监管的研究主要涉及理论、机构编制监管改革与绩效管理。其中理论研究主要有钱其智、王秦丰(1990)编写的《机构编制管理教程》,寇生杰、余兴安(1993)编写的《编制管理基础》等,侧重于关注机构编制监管在职能、机构、编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机构编制监管改革方面,刁田丁^[2](1985)、伏宁^[3](2011)、潘享清^[4](2018)提出将机构编制监管与行政体制改革相统一;卢志钊^[5](1999),梁昌勇、朱龙^[1](2014)则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区分了机构编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这

收稿日期:2019-10-06

基金项目:中共河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申领课题(课题编号:SL201901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飞,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领导干部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刘步先,河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构编制管理;梁坤,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类研究重在阐释机构编制改革经历的从政府管理调控到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绩效管理方面,匡素勋(2012)认为绩效管理不善是机构编制改革不善的重要原因^[6];徐刚、刘明广(2012)尝试构建绩效棱柱模型来指导政府机构编制评估^[7],用以检验机构编制的有效性。

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是推进机构编制管理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是切实有效地促进机构编制层次化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手段,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有力抓手,然而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海涛等^[8](2016)、青岛市编办(2017)认为借“互联网+”的东风,有效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优势,能够在“互联网+机构编制监管”体系的决策、管理和运转过程中取得良好成效。耿建^[9](2016)、安徽省编办(2018)、福建省编办(2018)等更多地关注了“互联网+机构编制监管”管理新模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机构编制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

1. 缺乏部门之间机构编制监管联动机制。机构编制监管工作与各相关单位的整体工作安排都有交集,单靠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往往力不从心。各相关部门的联动检查工作存在随机性、随时性的特征;各个联合部门之间的业务磨合熟练程度不够,承担的相关责任不对等;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结构,监督检查效果往往不明显。因此,提升各部门间联动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是机构编制监管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0]。

2. 机构编制监管意识不强。很多单位没有在转变职能、改善队伍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上下功夫,而是通过强调困难,向编制部门提出增编、增职数、增机构等要求,很少有单位会主动削减机构编制,对超编、超职数等情况不采取实际措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思维,机构编制部门虽然在审批过程中,能充分调研,严格把关,但限于历史、权责、监管手段等因素的制约,事后对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往往不足。

3. 机构编制监管工作模式单一。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方法和模式不灵活,监督性和权威性有限。当前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工作程序规范性不强,相关人员配备缺乏,致使对检查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相关问题难以深入调查研究。机

构编制部门没有处罚权,监督管理权受到制约,检查出问题后只能上报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无法对问题部门进行严肃处理,导致监督性和权威性的降低。

总的来看,国内各地的机构编制监管工作起步较晚,存在缺乏联动机制、重视程度不高、工作模式单一等问题,给机构编制监管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互联网思维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摆脱机构编制监管难的困境,为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开辟新的路径。

二、研究文本的编码及基本数据

为了确保分析文本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通过“中国机构编制网”下“机构编制信息化”板块来提取研究文本资料,资料普遍为具体工作情况的梳理与汇总,非学术文章,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通过浏览“机构编制信息化”板块内文章,一共提取了17篇与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相关的文章,形成了6个一级节点,21个二级节点。研究共有三个循序渐进的步骤,首先是进行词频分析;然后根据高频词语,结合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工作实际,确定一级节点并进行编码;最后确定二级节点并进行编码、分类。

(一)词频初步统计情况

词频可以展现原始资料的主要关注点,是质性数据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NVivo11.0提供了可视化词频统计,将最小长度设置为2,对所提取的文本资料进行词频查询,可以得到文本资料的汇总信息及词云图,词云图如图1所示。其中可以明显看到社会、服务、情况、信用、企业、工作、登记、人员等词语。考虑到本研究关注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信息管理工作重点主要涉及平台化建设与应用,内外信息沟通大量使用社交媒体,“互联网+”的管理思维注重管理成效提升。因此,最终形成了平台化、工作机制与模式、社交媒体、队伍建设、成效等5个一级节点。

(二)措施编码

本研究采用手动编码,手动编码较自动编码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参考点。在平台化、工作机制与模式、社交媒体、队伍建设、成效等5个一级节点的基础上,确定二级节点并进行子节点编码,如表1所示。平台化,设置的二级节点包括信息平台(21)(括号内为编码

续表 1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编码次数	编码举例
社交媒体	对内管理	9	浙江省衢州市:通过微信、QQ等网络平台建立工作群,加强与网信办、公安网警、电子政务中心等有关部门联动沟通
	对外服务	9	山东省淄博市:开通了“淄博事业单位监管”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为“zb-pir2016”
队伍建设	专人	12	浙江省衢州市:明确专人负责网上名称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培训	4	浙江省衢州市:每半年组织编办系统内业务骨干开展一次集中培训
成效	促进发展	6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全面激活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提升满意度	10	山东省淄博市:便民服务
	消除信息壁垒	8	陕西省宝鸡市:解决企业监管信息区域化、分散化和碎片化问题,实现与质监、食药监、税务等市场监管部门信息互联互通

三、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的实现路径

(一) 抓好制度与电子台账建设

加强机构编制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与电子台账建设,从“软”“硬”两个维度扎实打牢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的基础。

一要完善机构编制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原有的规章制度对纪律的约束力有限、违规的界定性模糊,应通过法治化建设制定机构编制管理行政法规,并配套具体的实施细则,为管理行为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监管处置工作制度化,维护监管工作的权威性,机构编制监督检查过程中凡是遇到不配合、不讲原则、敷衍扯皮、违规干预等行为一律追究其行政纪律责任与法律责任。

二要加强电子台账建设与管理。应全面记录所辖地区各事业单位的基本信息、变更登记信息、业务范围清单、绩效考核信息、年报公开信息、日常监管信息。这就要求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对所辖地区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信息开展全面梳理,以各事业单位纸质台账、各地区机构编制监管网站数据为基础,建立机构编制监管电子台账。

(二) 积极开发建设监管云平台

云平台所提供的各类数据服务可以突破原有的空间限制、信息壁垒与管理瓶颈,以基础与监管数据库、跨区域协同监管处置平台、动态信息共享与管理平台、信息发布与公开平台、分析预警平台为基础架构的事中事后监管云平台,能够实现多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

借助云平台构建省、市、县、镇多级纵向贯通,部门、行业、社会横向互通的立体式监管新模式,用以实现“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检查。通过一次抽查、全面体检、综合会诊,减少对部门主体的干扰,形成一处失信、人人可知、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新机制。打造智慧监管、云监管,实现服务对象在线享受服务,提高公共服务效能。整合公共资源,不断优化互联网与公共服务资源融合深度与广度,为公众提供互联网在线服务。实现监管型向服务型的转型升级,切实做到监管服务双到位,体现利企便民。

(三) 善用社交媒体平台

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提供信息发布推送、链接服务、便民服务等功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推送事业单位监管政策规定、通知公告、工作动态等;提供机构编制网、监督管理网、年度报告公开、业务范围清单、绩效考核结果公开等机构编制服务链接;提供已登记事业单位名录、机关事业单位网站中英文域名导航、事业单位监管工作流程、重要事项提醒服务、差旅费报销规定以及联系方式等内容,方便单位及群众办理业务。借助社交媒体落实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众的监督权与知情权,及时公开不涉密的政策法规,及时公开本单位的人员编制配备等情况,强化信息公开透明,提升公众的满意度。

(四) 加强信息共享,强化联动机制

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的信息关联、数据共享,实现部门联动、综合监管。

1. 信息互通与共享,形成监管合力。加强部门之

间的沟通,加强与网信办、公安网警、电子政务中心等有关部门联动沟通;通过微信、QQ群等网络平台建立工作群,掌握各类单位网站备案信息,实现底数清、情况明,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2. 丰富信息平台功能,有效利用共享信息。信息平台系统 in 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应添加事业单位信息、通知发布、信息查看、通信录、系统管理等功能板块。通过平台,各地联席会议办公室可及时上传更新事业单位相关信息情况,实现信息共享。成员单位能够通过事业单位信息功能板块,查看事业单位异常信息;可以快速链接到其他政府服务网站,查询事业单位法人的信息公开和信用情况,作为办理相关业务的依据。成员单位能够通过信息查看功能板块,查看、制作、发布信息,及时通报业务办理中发现的事业单位存在的问题。

3. 完善网上行政审批服务,实现数据共享。通过移动互联网、手机应用等现代化手段,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加速提升部门上下级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实现智慧化、数字化沟通交流。

(五)推进“互联网+监督管理”常态化

通过完善制度、优化机制可以有效推进“互联网+监督管理”常态化。一是改革完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一站式办理在线审批、网上办证、业务查询等行政手续,推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及时将事业单位的年度报告内容在编办网站上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主动做好“双随机”抽查工作,规范事业单位事中事后监管。对群众关心、社会关注度高的学校、医院、安监、食药监、环保、工商等重点部门,先行建立随机抽查跟踪督查机制。三是各地可以以省一级事业单位监管信息系统为依托,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业务。推进随机抽查事项库、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事业单位异常信息库等四库名录建设。四是重视结果公示,保证抽查效果。抽查结果通过机构编制网、政府门户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对抽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限期内未整改到位的,记入《事业单位异常信息库》,通过编办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最大限度地让公众参与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五是通过网站监督平台完善公开与公示制度。每年年初在事业单位监督管理网站公开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每季度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和

编办门户网站将事业单位法人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的名单对外公示,同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邮箱和通信地址,接受社会监督。六是线上监管和线下监管相结合,提高监管效能,促进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监管行为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监管部门、事业单位、公众等多主体的协同监管机制。

(六)加强机构编制监管队伍建设

1.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维护更新。一是制定台账维护相关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事业单位信息档案电子监管台账维护,严禁非台账管理人员私自修改台账中的内容事项,维护台账的准确性。二是事业单位监管台账内容发生变化,需分管领导审核后予以确认;确定台账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完成更新,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时效性。三是指定专人网上巡查,定期巡查与随机巡查相结合,结合日常管理,对存在挂标不规范等问题的政府网站、网络平台,制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并监督其整改情况。

2.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能力意识。组织有关部门网站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学习,集中为编办系统内工作表现好、业务能力突出的同志开展专题培训。教育培训宜采用多种形式,也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组织学习上级编办关于机构编制监管工作的新精神新任务新要求。通过学习交流,可以有效地统一思想、提升意识、增强本领、提高能力,为推动落实机构编制监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梁昌勇,朱龙.顶层设计下的政府机构编制资源优化管理研究[J].行政论坛,2014,21(3):31-36.
- [2] 刁田丁.论我国地方国家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J].政治学研究,1985(2):50-52+11.
- [3] 伏宁.关于职责、机构、编制的基础研究[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1(5):29-31+8.
- [4] 潘享清.新时代行政管理学会的定位及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18(6):147-150.
- [5] 卢志钊.从传统编制管理到行政体制改革[J].贵州社会科学,1999(5):22-26.
- [6] 匡素勋.我国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改革路径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2,22(11):1334-1337.

- [7] 徐刚,刘明广.政府编制绩效评估机制:棱柱构架及双价值向度[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6):80-85.
- [8] 李海涛,李强,白金旸.“互联网+机构编制”工作设想——以新乡市为例[J].行政科学论坛,2016(9):12-14.
- [9] 耿建.推进“互联网+机构编制”管理新模式问题分析与思考[J].机构与行政,2016(9):46-48.
- [10] 王启宁,魏光然,王业盟.加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机构与行政,2016(5):56-58.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ization Supervis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Based on NVivo

WANG Fei¹, LIU Bu-xian², LIANG Kun¹

(1. Party School of the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Provin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and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reform,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ization supervision of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implement of the reform pla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work of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and supervision, it can strengthen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of ledgers, build cloud platform, make good use of social media, promote “Internet +” norm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eam build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ability.

Key Words: Internet +; supervision of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coding analysis; NVivo

责任编辑:刘博

文化自信视域下红色文化价值的系统审视

田野¹, 陈思²

(1.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 300191; 2.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是红色文化的实践基础。红色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精神内核,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重大影响。坚定文化自信,蕴含着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只有克服当前弘扬红色文化的一系列梗阻,才能实现对这一价值的塑造。

关键词:红色文化;价值;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2-0069-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文化自信”的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将文化自信纳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内容体系,并突出了文化自信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增强文化自信,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红色文化作为革命时期新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不仅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关键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也发挥重大影响,更是当前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一、价值源泉:

红色文化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不断为红色文化增添新的内涵,是红色文化的实践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的理论来源

首先,红色文化的产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P2)}红色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红色经济”的发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偏远山区和农村发展革命力量,建立起了中央苏区,为红色文化的培育提供了物质土壤。当时,由于敌人的一系列经济封锁,苏区建设困难重重,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苏区人民不仅实现了生活上的自给自足,而且为革命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产生的苏区文化,成为红色文化形成过程中最初的文化资源。

其次,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代表着中

收稿日期:2019-11-01

作者简介:田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基层治理;陈思,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马克思认为,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4](P410-411)}。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碎一切现有的国家机器。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化必然与一切旧的腐朽的文化区分开来,并对其展开深刻批判,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性。红色文化彰显了无产阶级文化彻底的革命性,在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文化展开殊死搏斗的过程中,红色文化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发展成为能够彰显民族文化底蕴,兼收世界先进文化理念,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鼓舞人心的革命文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不断取得成果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是红色文化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时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5](P695)}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新文化。红色文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勇向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为红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红色文化也在精神方面极大地推动这些实践顺利开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局面百废待兴,党和人民面临着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艰巨任务。红色文化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那些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等革命精神得到弘扬,并进一步发展出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不断激励党和人民顽强拼搏,克服重重阻碍,完成各项艰巨任务。在改革开放时期,红色文化继续发挥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激励党和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价值系统: 红色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文化的功能和结构的方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

系。”^{[6](P138-142)}作为一个有机的价值系统,红色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外在功能密切联系,要理解红色文化的价值,必须深入其结构与功能层面。

(一)结构: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不同表征

学者们倾向于使用文化层次概念帮助理解文化结构问题,有学者指出,文化结构包含三个层次,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7](P81-98)},还有学者指出,文化结构包括两个层次,文化下层机构与文化上层机构^{[8](P278-279)},等等,解释多样,不一而足。通过这种层次划分,我们发现文化结构内部构成要素的丰富性,然而从普遍意义上讲,任何文化结构都包含内核与表征两个层次。所谓文化内核,指的是文化的精神特质,包括价值观念、道德品质、性格特征等。文化内核通过各种方式向外延展,呈现出文化的不同表征。

1.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P708-709)}红色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展现其精神内核。

首先,红色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部分国人对传统文化感到悲观。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中国文化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9](P8)}红色文化坚定地支持优秀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积极践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优良品质,一改当时国人的颓废气息与不自信状态,鼓舞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其次,红色文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彰显科学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红色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以此为教条。针对革命时期出现的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0](P111)}因此,我们党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确立为思想路线,坚持在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准确制定方针政策,部署行动计划,不断克服困难与挑战。

第三,红色文化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彰显人民性。红色文化始终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价值追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努力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能起到鼓舞人心作用的优秀作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可以看到体现红色文化的歌曲、戏剧、诗歌、小说等各类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同甘共苦的亲密感情,鼓舞着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断取得事业上的成就。

2. 红色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征。从历时性角度看,红色文化具体呈现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里形成的文化。刘润为指出:“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11](P4-7)}所谓革命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的统称;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党和人民在奋斗拼搏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先进文化的统称。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各个时期红色文化呈现出多种样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具体体现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红色文化具体体现为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丰富的样态充分体现出红色文化的延展性,为红色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载体与抓手。

(二)功能:红色文化价值的不同侧面

红色文化结构塑造红色文化功能,红色文化功能赋予红色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方面具体理解红色文化的功能。

1. 红色文化的政治功能。一个政权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一方面,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政权形成。“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5](P70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党和人民

浴血奋战、顽强拼搏,推翻“三座大山”,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促进红色政权发展。一个政权要实现发展,首先必须具备合法性,即“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12](P35-36)}。在这方面,红色文化已经内化为红色政权的标志性文化,作为我们党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高度凝练,红色文化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发挥着巩固红色政权的重要作用。

2. 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13](P48)}红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红色文化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经济生产活动方面。在革命时期,红色文化激励着广大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动红色经济发展,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物质保障。那个时候创作的诸如展现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一系列文化作品,都歌颂了党和人民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积极促进经济发展的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文化依然激励着党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使中国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朝着强起来的目标不断迈进。此外,红色文化本身也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党的十八大指出,要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使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1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文化本身具备实现产业化的条件,以红色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红色文化产业很好地刺激了消费,拉动内需增长,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凸显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3. 红色文化的社会功能。红色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其教育意义上。首先,红色文化可以发挥解放人民思想的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采取各种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在广大偏远山区和农村根据地掀起思想解放运动,传播先进科学思想,扫除这些地方老百姓头脑中的封建落后思想,将他们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其次,红色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红色文化凝练着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经验,

其所包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秀品质,是对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盛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有助于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将个人的发展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联系起来。红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代青少年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可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艰苦朴素、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成为红色文化传承者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三、价值分析： 弘扬红色文化的现实梗阻

当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阻碍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接受与认可,阻碍人们坚定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张力运动下的矛盾困境

当前中国的任何文化要实现发展,都必须应对一个共性问题,即在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之间的张力运动中寻求合适的空间,通过自身的发展去消弭这种矛盾困境。所谓文化自负,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及其价值的一种盲目高估。我们对五千年灿烂文化非常自豪,但也很容易滋生骄傲自负的情绪。古代中国自封为“天朝上国”,将其他民族和国家视为蛮夷之邦,以至近代,因为不愿正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付出惨痛代价。在经历血的教训后,国人又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鸦片战争后,国人心里被打下了文化自卑的烙印,以致出现种种批评传统文化、追求“西化”的论调,更有甚者,主张“全盘西化”,这些流弊至今仍有体现。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之间的张力运动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就红色文化而言,人们一方面相信这是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在看到西方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物质生活丰裕奢华的时候,也有人会对红色文化强调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精神产生质疑,这就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张力运动,我们就无法真正弘扬红色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二)训导主义下的畸形文化授受关系

社会化是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我们通过教育完成红色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在实现红色文化

教化功能的过程中传承红色文化。教育场合与媒介多种多样,在家庭、学校、单位和社区中,在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上,都可以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然而,红色文化教育过程中存在训导主义的积弊。这种训导式教育凭借权力强迫个体接受红色文化。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15](P193)}训导式的红色文化教育本质上塑造了一种畸形的文化授受关系,虽然可以完成知识授受的任务,却牺牲了主体的学习主动性,因此产生的更多是平庸与服从,这不利于培养人们对红色文化的兴趣,也不利于红色文化在传承中获得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训导式的教育使红色文化沦为一种教条,使红色文化教育沦为一种“宣传”“仅仅为了迎合各种活动需要而进行的红色宣传,除了显示一种训导主义的霸道和教条之外,难以有所建树”^{[16](P72-73)}。要真正弘扬红色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走出训导主义的教育怪圈。

(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文化表达危机

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影响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我国的文化世俗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使国民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易造成文化过度世俗化的倾向,即在文化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容易出现“以通俗的方式迎合大众口味,凭借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流行文化产品”^{[17](P168-172)}的问题,导致出现文化泛滥、文化庸俗化现象。文化过度世俗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一些红色文化作品会采用庸俗低俗甚至恶俗的表达方式。更有甚者,为了谋得经济效益,不惜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剥离掉,填充一系列“迎合物”进去,这是一种红色文化“空壳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在弘扬红色文化,实则通过炒作红色文化来谋取利益。如果不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红色文化的表达危机进行治理,长此以往,可能会使“人们对于革命时代的激情,丧失了认同的欲望,却保留了猎奇的幻想”^{[16](P72-73)}。我们要广泛传播红色文化,但决不能以红色文化的庸俗化为代价,在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红色文化的世俗化与市场经济的逐利倾向之间的张力问题。

四、价值塑造：

通过弘扬红色文化推动坚定文化自信

塑造红色文化当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完善的应对机制,克服弘扬红色文化的现实梗阻。

(一)坚守红色文化精神内核

梁漱溟先生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逐渐衰落的原因就是没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保持好自己的个性。^{[9](P7-8)}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在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决保持红色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精神内核,保证红色文化不变色。首先,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其次,要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18],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保持好我们的民族特性。第三,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通过创作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鼓舞人们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

(二)赋予红色文化新的生机

弘扬红色文化,关键要紧随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络,发现时代问题,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潜力,赋予红色文化生机活力。首先,要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帮助解决时代问题,是我们党的一项宝贵经验。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两座大山”,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这是借古人智慧帮助解决时代问题的范例。其次,要从红色文化自身挖掘有价值的内容。作为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红色文化在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精神谱系,对克服时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必须加大挖掘力度。第三,要努力为红色文化增添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要大力开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内容,比如女排精神、深圳精神等,使其融入红色文化体系。第四,要坚决抵制庸

俗腐朽文化对红色文化的侵蚀。要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弘扬主旋律,抵制庸俗腐朽文化,保证红色文化的纯洁性与高尚性。

(三)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在传播过程中,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实现发展与传承。当代社会,科技发展使文化传播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利用好新工具传播红色文化。首先,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在继续运用好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的同时,要大力开发新媒体,比如互联网、“两微一端”等,使其成为红色文化传播新的利器。其次,要慎重对待红色文化产业化问题。要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给红色文化带来的冲击,加强监督与审核,更多推出高质量的红色文学作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民,抵制文化泛滥、文化庸俗化倾向。第三,要积极创造红色文化体验机会。除了知识传授外,在实际生活中体验红色文化,也是人们理解与感悟红色文化的重要方式,要多开发一些红色文化体验项目,让人们走进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文化圣地,去感受领悟红色文化,寓学于乐,推动红色文化更好传播。第四,要坚决克服训导主义积弊。要创作作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作品,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增强人们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与主动性,抵制强制性教育。

(四)推动不同文化交流互动

文化交流为文化发展提供契机。红色文化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弘扬红色文化,必须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互动。首先,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循。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其次,要对外来文化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取长补短,推动红色文化获得新的发展。第三,要积极促进红色文化对外传播。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方式,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第四,要坚决抵制封闭自守倾向。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交流过程必然带来一些庸俗腐朽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冲击,但决不能因畏惧而故步自封。红色文化从不畏惧斗

争,而且正是在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彰显真理性,获得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当下,红色文化更应该在同庸俗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彰显魅力、生发活力。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9]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复兴的。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深刻理解红色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价值,通过把握红色文化的价值源泉,打造红色文化的价值系统,去弘扬塑造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坚定文化自信,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刘敏中.文化结构论[J].学术交流,1990(1).

[7]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1986(5).

[8]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M].长沙:岳麓书社,2010.

[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刘润为.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J].红旗文稿,2017(12).

[12]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4]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2).

[1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6] 周志强.红色文化空壳化忧思[J].人民论坛,2011(15).

[17] 刘波亚.红色文化认同的政治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16(4).

[1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9] 李斌.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1).

A Systematic Survey of the Value of Red Culture in the View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IAN Ye¹, CHEN Si²

(1. 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Tianjin 300191,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practice. Marxism 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red culture.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ctiviti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red culture. Red culture has spirit core of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ublic. In different periods, red culture presents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Red cul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Achiev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ulture. Only by breaking the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highlighting red culture, can we succeed in shaping contemporary values of red culture.

Key Words: red culture; valu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傅建芬

“五权耦合”推进社会高质量叠化发展研究

杜宏巍¹, 许正中²

(1. 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北京 100732;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叠加演化期, 亟须超越起点论和时间论, 紧握“权力体系”这一影响叠化走向和发展路径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 基于财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资本权、税权五个权力, 破解高质量发展情境下的新问题, 破除模块化思维, 探索高质量叠化发展下的权力新范式。

关键词: 权力体系; 五权耦合;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75-06

一、研究缘起

中国社会正处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叠加演化期, 正从高速发展社会叠化为高质量发展社会, 从工业社会叠化为智信社会, 从科层参与型社会治理结构叠化为扁平合作善治型社会治理结构, 从关系内卷型社会叠化为现代契约型社会, 从产业追随型社会叠化为产业先导型社会。处于这样重要的叠化期, 亟须超越起点论和时间论, 探寻影响叠化走向和发展路径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社会叠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叠化发展, 社会的正向演进变革关键在于人才创新力的有效激发, 而人才创新力的激发在于权力体系的充分授权与赋能。但是, 认真研判中国人才权力体系, 会发现存在权力赋能不足、权力界限不清晰、权力体系运作效率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背景及问题, 本文以人才创新力激活为出发点, 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探索能

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 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二、权力体系是高质量发展型社会的核心体系

当今世界时局错综复杂, 多股势力交错影响, 国际社会处于矛盾集中和高发期, 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必须挖掘影响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剖析问题背后的元价值观和基本思维模式, 全方位把握束缚叠化发展的关键变量, 精准确定发展方向的主要路径。社会高质量叠化发展, 需要综合考虑速率、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 影响三个维度有效结合, 就能确保社会螺旋正向叠化演进。影响三个维度的关键要素在于制度, 而制度的演进又是权力体系演进引致的。社会权力体系决定着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向、路径和效率, 具备资源调控、交换、惩罚和补偿功能, 权力体系的演进决定了制度系统如何进行选择性安排。现实实践

收稿日期: 2019-11-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知识权力和创新网络研究”(17YJC630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国家需求的海洋装备信息化战略研究——以海上自升式平台控制信息系统为例”(6174130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商业孵化器服务支持、双向嵌入与孵化绩效研究”(2018M630042);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雄安新区人才集聚多主体系统模型构建及演化研究”(G20182093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杜宏巍,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评价理论、政策评价、技术创新等; 许正中,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学与管理模式创新等。

中,社会权力精英通过制度体系满足了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导向,在社会非帕累托最优正向演进发展中耦合交织着政治权力寻租。只有在权力体系设置过程中,充分考虑最能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群体意志,实现稀缺资源的趋向最优配置,才会在复杂利益博弈中,构建出稳态正向叠化的路径。

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必须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因此,需要充分激活创新主体,也就是激活人才创新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之间的竞争。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实际上是通过权力赋能激活人才创新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人才发展环境尚不宽松自主,资源配置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权力赋能明显不足。参考国际经验,应该培育适宜创新研究的宽松博弈环境,同时尽可能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综上,把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权力体系的演进方向。只有以高质量的权力体系为人才赋能,持续正向影响生产函数和社会组织边界的叠化进程,在时空排列上实现质和量的优化排列,才能推进社会向着高质量方向叠化演进。

三、“五权耦合”的权力体系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

人才创新力激活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元出发点,以权力为人才赋能,就需要建立权力要素互为支撑的权力体系,从基础保障、创新引导、利益分配、杠杆倍增、民主善治等五个方面耦合优化能够为人才赋能的各项权力,并构建相互耦合、协同演化的权力体系。

(一)财产权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本质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和干预(巴泽尔,1997),财产所有权的有效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产权的研究非常深入,指出清晰界定产权边界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良好的国家政治系统将确保公民、企业、部门的财产所有权得到有效保护,避免不当形式的侵害和掠夺,并确保基于契约、合同的交换经济健康运转。过度治理的政策则会对产权造成损害,造成权力

残缺。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体系,对财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尽可能减少对私有财产权^①的侵害和损伤,明确产权边界,制定合理的保障制度。

我国财产权界定和结构叠化都是通过政府颁布法律推进和执行的,政府是产权界定和分配的主导力量。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部分属于非公共领域产权,尚未被清晰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则属于公共领域产权。由此可见,界定越模糊,属于公共领域的产权范围越广,私产权越少,虽然这样可调配的公共资源领域相对丰富,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活力则受到约束,这就形成了政治视角的矛盾冲突。财产权是市场交易的社会工具,帮助市场活动参与者判断进行市场交易时的利益保护和取得程度,财产权边界界定越明确,保护制度越完善,产权结构越合理,市场参与主体积极性越高,经济效率也将得到提高。

与国际社会先发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难题均和私有产权孱弱、公民权利孱弱、私法(民法)不足有关。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产权的私有化激活了工业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补充了私有产权制度,为创造中国经济的奇迹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民营经济制度的迂回与调整,中国对私有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呈现迂回态势,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二)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创新正向引导

随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信社会的逐渐演进,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将从社会的配角逐渐成为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相匹敌的重要权力,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配角走向主角。同时,我们看到知识产权中蕴含的知识支配力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壁垒,先发国家通过输出先进知识获取暴利,也通过遏制先进知识输出维持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知识产权的多向性应用,与国家的软实力、硬实力均密切相关,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

知识的发生和演变是与权力共生的,知识的权力性体现为凭借知识价值大小获得相匹配的权力,这不同于行政权力那样依靠等级制获得权力级别。知识产权体现民主性,而不是靠权威专断的方式来表达。具

^① 这里的财产权,特指人身权、继承权、所有权和数据产权。因知识产权和股权具备更为独立的价值,不包括在这里,进行单独分析。

有重大价值的知识能否确保自身知识产权,集聚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成果变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中国创新型社会建设,是高质量叠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不仅能够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还对整个创新型国家的惯例形成和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而知识本身又具备嵌入性、含默性和分布性等特点^{[1](P89-98)},创新型国家需要组织起分散在不同载体、不同节点的多学科、多专业、异质性^{[2](P121-132)}的知识,并加速知识集聚、推动知识流动、实现知识协作、促进互为催化,基于特定复杂情境,创造出推动创新^{[3](P56-78)}的关键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考虑不同网络位置的知识具备何种知识产权,每个行动者如何依托自身知识产权撬动所需资源、如何实现网络知识产权优化搜寻,加速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浓度和创新质量,是需要认真探索的方向。

(三) 股权配置以利益配置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社会的进步受人力资本发展推动和制约,人力资本也是各部门发展的源泉。而人才的行为路径和发展意愿很大程度上与激励性制度系统相关,股权则是激发人力资本跨越式或稳健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制度性工具和手段,保障了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了经济部门剩余索取权的合理配置。历史上社会每一次进步,都交织着利益分配的斗争,社会制度也一直在朝着合理保障人力资本利益,激发人力资本活性的方向演进。反之,人才得到有效利益激励和保障,也会更加有效实现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上升,进而有效促进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叠化发展。

国内外较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股权对社会和经济部门、对人才的激励作用。比如国内部分学者基于中国情境指出: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4](P146-154)}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业绩通常在1年后明显改善;^{[5](P1-6)}高管受股权激励后,会明显提升公司投资效率^{[6](P90-96)},也会减缓公司债务增量过快;^{[7](P29-34)}同时,可以解决公司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改善公司资本投资效率;^{[8](P70-81)}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9](P85-99)}

我们进一步将视角聚焦于当下叠化期的社会和经济状态,会发现随着多期、多要素的叠加演化,股权制度构建遇到了更多的实践问题,股东角色得以进一步

分化,股东权益的分配方式得以通过更多形式和方法进行配置,这些都对进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 资本权力实现利益杠杆倍增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驱动力,如何借助资本配置扩大创新效益是重要议题。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而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中国进入了一个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逐渐涌现的时期;中国科技已经步入强国之列,达到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边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2016)。但是,我们看到如此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多没有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峡谷”,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融资渠道、融资方式供给不足。金融正逐步转变为主导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技术与金融结合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杠杆”效应,既可以扩大创新,又可以倍增利益。在“资本为王”过渡到“智本为王”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应该逐步将金融科学,高效地围绕创新人才进行合理配置。要想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就需赋予合理的资本融资渠道和权力。但是,因为资本方、债权人和企业管理者存在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企业管理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融资成本有所不同,引致融资约束,最终形成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情况。^{[10](P187-221)}

此外,资本也是调节空间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资本要素的配置会吸引劳动力、技术及各类生产资料要素的跟随性涌入,最终形成生态系统的全要素配置。资本配置通常分为政府主导型配置和市场自发型配置两种,政府主导型配置主要考虑公平性和协调性原则,而市场自发型配置则主要考虑效率性和收益性原则。政府引导资本配置有利于缩短中国东南部和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但是政府在引导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过度干预,或者将资本吸引到本地区后,未能提供较好的营商环境,规则规制仍存在较多问题,导致资本利益受损。因此,需要平衡好政府和市场对资本配置的关系,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提升创新发展为目标进行资本引导和配置。

(五) 优化的税制税权实现民主善治

在所有的关系中,税收关系是公民和国家最紧密的关系。税收法律关系其实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的关系问题。^{[11](P122-126)}

国家财政来源于税收征收的公民私有财产让渡,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公民供给,因此可以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税的私有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国家税收权力的正当行使才是其作为代理人正当性的根基。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国家税收具备权力的强制性和侵犯性,税收执法权的非正当行使将给公民造成权利侵犯。因此,需要厘清国家和公民税收关系,确定科学合理的税收界限,赋予公民合理有保障的税收。当税收税权明确后,国家机器不应再以其他理由获取、侵占公民私有财产,并应推进多种政策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积累。

在税收制定时,还要充分考虑税收的多寡对创新驱动的影响。国际社会关于税收政策与自主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活创新活力,但也有研究发现仅对部分行业有效(Shah, 1995)。典型代表研究如:曼斯菲尔德(Mansfield, 1986)调研发现,美国政府每进行1美元的税收抵免,企业将增加0.35美元的研发投入。布鲁姆(Bloom, 1997)调研分析,每减免10%税收,将刺激增加1%的短期研发投资和10%的长期投资增加额。^{[12](P85)}在中国税收史中,税收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库积累资金,随着对科学技术进步重要性认识的提高,针对推动自主创新进行了税收职能改革。总体而言,中国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3年的初始阶段,1994—2005年的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的完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根据中国国情发挥了不同效力。应通过税收税权的合理调节,有效降低税负、减少税痛,并促进技术创新正向叠化。

四、中国高质量发展 情境下的“五权”新困境

我国历史上,私人财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资权和税权在公权力面前一直弱小,甚至有时微不足道。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宪法的多次修订,国家对私有产权、股权等权利也从完全否定过渡为逐步认可保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关于这些权利的界定与保护处于不断更迭中,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叠化出了独具特色的私有权利保护路径,并最终形成了刻印中国经济发展痕迹的

公民权利体系转型发展轨迹。^{[13](P72-81)}虽然取得了较多进步,但是离高质量发展仍有距离,面临着系列矛盾与困境,而这些矛盾与困境又多与中国政治、文化交织。

数据演化为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成难题。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持续、创新应用,数据不仅以爆炸式态势增长,更成为新业态、新领域、新模式的关键生产要素。2017年,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分析数据的基本属性及特点发现,数据与其他传统财产不同,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无穷性^{[14](P104-119)},这导致数据产权的确定和保护并不适用传统法律和方法。数据产权的不明确和无保护现状,导致了大量的公民隐私泄露与侵权,也导致了公司之间的数据不合理竞争等各类非规范化交易,由此引发的矛盾不仅更为广泛和激烈,也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数据主导权。

缺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贸易战中凸显被动。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内生动力的叠化,对知识产权的影响同样巨大。知识产权在过去一直处于“一保护就被仿制”的困局,虽然山寨经济有很大改观,但是面对国际竞争和中美贸易战时,中国知识产权战略仍旧弱小,既因保护不足和监管不利导致存在假冒伪劣而被国际社会诟病,又因创新活力不足缺乏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被先发国家牵制。“知识产权—创新—高质量发展”这一正向演进路径仍需得以更好的保障。

股权激励普遍推广,国企混改仍需探索。华为、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的股权分配实现了员工利益分配,造就了一批富翁,也通过利益激励推动着企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现代企业引进的股权分配策略多来源于先发国家,在应用到中国企业中时,遇到了系列实践纷争问题,需要进行适应化变革。

新经济资本过热,传统实体发展遇困境。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目前,中国总体资金并不匮乏甚至超发,却有很多优质制造型企业无法获得资本注入,这也是当下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这是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资本问题,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本渠道,形成资本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各国纷纷加入低税战,抢夺高端企业和人才。国际社会均以税收争夺人才与企业,纷纷提出不断优惠的税收制度。中国2015年前后较著名的“死亡税率”

之争,引起了较广范围的讨论。2019年以来,政府推出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初见成效,但是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仍旧无法有效通过宏观税收政策促进经济上扬。因经济下滑等多种因素交织,企业主仍旧具有较明显的“税痛”。新形势下亟须研究税收政策如何发力,税权如何保障,才能推动高质量社会发展。

五、破除模块化思维, 探索高质量叠化发展下的权力新范式

政策高质量发展需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需求”为方向。面对新变革、新形式、新环境,五种权力的确权与保障模式应该打破传统模块化模式,在法律体系、国际话语权、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重新构建更适合新情况的发展范式。

采用追踪机制,进行数据确权。传统的产权保护是基于排他性或独创性,但是数据产权不适宜这类确定方法;同时,在法律层面,数据产权的确权与保护也不适用于“结构—行为—效果”这一传统分析框架。^{[15](P13-17)}这需要突破现有制度规则的藩篱,充分考虑数据要素的独有特点,建议采用“追踪机制”,明确数据的“独立来源”,以独立来源进行数据的科学确权,并进一步明确大数据交易机制,明确交易流程和定价规则,进行数据确权后的合法分享与抓取。

激发创新活力,抢占国际话语权。优化顶层元政策,构建政策子系统,激活创新,抢占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权力的国际话语权。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中国话语权,将知识产权战略衍生为中国软实力,在知识产权领域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的主宰者。^{[16](P57-60)}这就需要中国政府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完善顶层元政策,并逐级构建包括区域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17](P18)}等子系列,由此构建一个具备完善性、系统性、领先性、协调性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同样,数据产权也需要制定国家战略,抢占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政策制定与评价中,要综合考虑政策的周期规律、对创新和政治经济的传导机制、客体利益平衡机制、政策外部性等方面内容。只有基于多维度的因素综合考虑,建立实现知识生产与传播多方高效的制度^{[18](P53-60)},才能更

好地实现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变革。

优化股权交易,兑现人才利益。在诸多股权问题中,尤其应该关注场外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为更多的中国人才和企业提供股权交易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保障。为了发挥股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建议采用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形式,构建“人才板”区域股权市场。挂牌条件除了常规条件外,比如企业存续期、经营规范、主营业务突出等,“人才板”的挂牌条件应该更加体现人才潜力、创新力等特点,为创新企业量身定做上板条件,体现人才元素,与其他板有所区分。引导“人才板”向着规范化、标准化、证券化的价值型交易方向进步,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激活人才的发展潜力,推动现有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成为价值型产权交易为主,可不间断性交易的、高效率的初级资本市场。

优化资本融资模式,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政府与市场联合优化资本融资环境及模式。资本融资有多种形式,可以重点关注优化中小企业集合债,采用“政府+企业”担保基金的模式,实现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府层面,建议成立政府担保基金,作为集合债发行担保的引导基金。市场层面,由在位企业联合构建会员制的联合担保机构。同时实行两级担保模式,第一步,遴选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进行集合发债,协商产业内在位企业进行一级担保。政府可以适度予以财政补贴支持担保企业,比如税收抵扣、给予科技创新补贴等,进一步激发在位企业活力。第二步,推动二级担保即反担保,由介入发债的各企业根据总债数额限度的百分比向担保机构提供相应额度的反担保。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应积极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模式,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商标、股权、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抵押担保模式实践。

从减税走向轻税,赋予纳税人更多自主性。首先,从世界发展规律和现状来看,轻税制显然更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其次,中国国情特点决定了纳税人的税权缺失,减税许可似乎成为政府官员的特殊权力,官员的权力一直大于企业的税权,本末倒置的纳税环境使得减税会变相为个别权力掌握者提供寻租空间。第三,减税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中央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减少税负,但是效果仍有待提高。因此,应从长期考虑,逐步安排,变现在的减税模式为轻税模式

才是长久可行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 [1] 罗珉,夏文俊.网络组织下企业经济租金综合范式观[J].中国工业经济,2011(1):89-98.
- [2] Savory, Clive. Building knowledge translation capability into public-sector innovation processes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09(21).
- [3] Cowan R, Jonard N, Zimmermann J B.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on network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7(53).
- [4] 董斌,陈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研究[J].商业研究,2015(6):146-154.
- [5] 张俊瑞,张健光,王丽娜.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考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1):1-5.
- [6] 刘美玉,姜磊.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J].经济问题,2019(6):90-96.
- [7] 郑志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股权融资与债转股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7,31(6):29-34.
- [8] 汤萱,谢梦园,许玲.股权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资本投资效率[J].金融经济研究,2017,32(4):70-81.
- [9] 芮红霞,郑江淮.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3):85-99.
- [10] Myers, Stewart C., Nicholas S. Majlu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3).
- [11] 秦玉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关系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1,29(11):122-126.
- [12] Bloom Nick, Rachel Griffith, John Van Reenen. Do R&D tax credits work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 1979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2).
- [13] 王庆明.产权变革路径与起源之争:立足转型中国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8(6):72-81.
- [14] 刘灿.我国转型期财产权结构及其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6(3):104-119.
- [15] 丁文联.数据竞争的法律制度基础[J].财经问题研究,2018(2).
- [16] 董涛.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十年反思[J].知识产权,2014(3):57-60.
- [17] 孙运德.政府知识产权能力研究——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政策视角[D].长春:吉林大学,2008.
- [18] 张耀辉.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J].中国社会科学,2011(5):53-60+219.

Research on “Five Power Coupl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Overlapping Society

DU Hong-wei¹, XU Zheng-zhong²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is in a period of multi-faceted,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evolution. It is urgent to transcend the starting point theory and the time theory, and grasp the “power system” as the core elements and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overlapping trend and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quity, capital right and tax right, we can solve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reak the modular thinking, and explore a new paradigm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overlapping.

Key Words: power system; five power coupl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傅建芬

社区协商中的 公众参与效能感研究

杨守涛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摘要: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代表着参与社区协商的人们对社区协商及其实践情况的一种感知与评判。这种感知与评判,关系到社区协商实践绩效、社区协商实践公信力、社区协商实践可持续性,以及社区治理绩效与党和政府形象塑造。通过问卷与访谈等调研方法,初步考察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现状,发现当前社区协商参与还存在效能感不高、科学性有待引导等问题。因此,在进一步提升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同时,强化并提升其科学性、不断促进其优化完善,是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认真面对和做好的课题。

关键词:协商民主;社区协商;协商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81-09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协商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更是受到高度重视,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印发和实施。2015年7月,中央还专门针对社区协商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各地也陆续制定了实施意见,民政部还于2016年8月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通知》。此后,很多关于基层治理、社区治理等内容的相关文件也特别强调社区协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该意见特别指出,要“推动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尊重多数人意愿又保护少数人合法权益的城乡社区协商机制”^[1]。另外,民政部有关领导在接受《民生周刊》专访时也提出,推进城市社

区治理必须建立健全诉求征集、诉求回应、主体权利行使三项机制,并且特别明确地提出,建立健全这三项机制的关键,“在于用好社区协商”^[2]。

在社区协商建设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协商活动和其他基层协商实践一样“如火如荼地展开”^[3]。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在当前的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全国各地在坚持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居)民会议制度等原有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制度的同时,积极探索村(居)民说事会、村(居)民理事会、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恳谈会等城乡社区协商实践形式。目前,公开报道过的典型案例也很多,比如,山东省、陕西省、贵州省等地的城乡社区“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机制,北京市丰台区大井社区的“新闻直播间”工作机制,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探索推行的“社区议事厅”,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的“双协商”与潞城镇

收稿日期: 2019-08-26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基层协商民主经验研究”(19ZGA002)

作者简介: 杨守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协商治理、党的领导建设。

的“微协商”,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的“协商善治”,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共商共治”,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三会村治”模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3354”社区协商工作模式,云南省嵩明县的“村务会商”制度、山东省沾化县社区事务“诸葛亮会”制度,等等。另外,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实践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社区协商实践的总结提炼。一些地方还对本区域内社区协商实践情况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总结,比如,《人民日报》曾对山东省济南市相关情况有过一则报道^[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社区协商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事关社区协商的制度化、长效化发展。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制度建设、协商文化、协商素养等方面展开思考。其中,公众的协商参与效能感就是一个重要视角。效能感决定着有关主体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参与和支持,是其展开社区协商参与行动的先发性心理,影响其社区协商参与的取向。同时,效能感还“涉及广大群众对协商以及协商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评价,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协商的认同、支持、再参与情况”^[5]。

二、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研究

相关文献梳理

在目前已查阅的国内外文献中,对于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研究相对缺乏,专门讨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文献也较少。总体而言,仅有部分文献对协商参与效能感作了简略甚至只是间接的论述,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协商参与效能感进行高或低的判断。何包钢和吴进进曾在讨论公共协商的合法性功能时,用“市民对政府公共协商的主观感知”描述了中国36个城市的情况,指出“最低的是郑州市,仅为5.3,最高的贵阳市,值为6.8”^[6]。李强彬和李佳桢探讨了协商获得感问题,并对协商机会获得感和协商结果获得感进行了测量,问卷得分均值分别为2.59、2.26^[7]。孔祥利在讨论社会组织协商时,则直接使用了效能感这个概念,并指出“公众参与效能感不强”^[8]。

第二类是指出效能感影响协商参与。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篇名为《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与公共协商

参与》的文章,作者认为,“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村民协商参与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且内在政治效能感还能通过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村民的协商参与”^[9]。国外也有研究表明,拥有较高效能感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10]。还有研究指出,外在效能感相较于内在效能感而言影响更大^[11]。

第三类是讨论协商民主实践本身对公众参与效能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有研究提出,“参加协商民主反而有可能使得本身对政府没有怨恨的民众受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而增加了对政府的怨恨情绪”^[12]。这种影响也可能是正向的,有研究者根据温岭实践指出,“民众对民主恳谈具有较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及评价取向”^[13];还有研究者根据某街道的实践指出,“在长期的而且是比较成功的系列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干部群众的协商感有所提升,他们对协商实践存在情况、协商真实性、协商有效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积极评价”^[14]。就国外文献来看,有研究者曾通过实验研究指出,协商式决策对公众的内在效能感未必会有直接而积极的影响^[15];有研究者同时讨论了参与协商民主过程对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响^[16];还有研究者强调,听证会这种协商民主形式对公众参与效能感有着积极影响^[17]。

第四类是阐述影响参与效能感的其他因素。有研究者指出,“村民社会网络调节着政治效能感”^[9]。还有很多研究作了间接阐述,如现代化逻辑下的协商民主运行还比较稚嫩和粗陋^[18],协商制度供给不足^[19],一些协商主体履职水平不高^[20],等等。在这一方面,国外文献多数是间接阐述影响公众参与效能感的具体因素。有从消极影响的角度阐述的,如有人指出“拥有权力的官员没有协商的动机”^[21],还有研究者提到一些官员不能很好地听取公众意见^[22]。当然,也有从积极影响的角度阐述的,例如,有研究者谈到美国社区共治中“公民和行政官员……共同决定要做什么”的做法取得了较好效果^{[23](P7)}。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这些研究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以及可拓展讨论的空间。

第一,在现有研究文献中,一般性的研究成果较多,深入研究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成果较少。综观

已有的研究文献,即便是那些直接涉及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文献,往往也只是从协商参与效能感的角度加以讨论,并未涉及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

第二,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对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测量,并没有作太多讨论,也没有关注到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测量维度等具体问题。有一些研究文献涉及了协商参与效能感的测量,但也仅仅是描述性的阐述,或者是没有依托一定测量维度的简单数字化处理。

第三,在现有研究文献中,讨论效能感和协商参与相互作用关系的成果较多,关注效能感实际状况及其优化措施的成果较少。对于协商参与效能感,理论的讨论是重要的,但实际情况的描述与分析,特别是基于这种描述与分析所展开的进一步的讨论,如提高协商参与效能感具体途径的建议,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而在目前可查阅的研究文献中,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少。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访谈法和问卷法,专门对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进行调研和讨论。

三、新时代背景下

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24]。而城乡社区协商则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25]。具体而言,社区协商是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主体,通过理性对话机制参与社区治理的系列活动之总称。本研究要讨论的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就是广大社区群众在上述系列活动中对所参与的活动及参与体验的判断。

实际上,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代表着政治效能感在社区协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所谓政治效能感,一个较为通俗易懂的论述是,“个体对自身政治行为影响政治过程,进而促使政治及社会发生变革之能力的感知”^[26]。在关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文献中,往往把政治效能感区分为两种,即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

效能感。根据研究者的论述,前者主要是指“公民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的认知”,后者则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体系对他们需求的回应的认知”^[9]。参照学者们对政治效能感的阐释,可以将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界定如下:社区协商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参与民主协商活动的相关主体对参与的活动、对参与行为影响社区协商及其过程,对参与行为使得社区协商取得效果及社区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能力和体验的感知与判断。同时,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也有内在和外在之分。

在强调要发挥协商民主作用、加强社区治理的新时代,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意味着不仅仅要关注社区协商相关的理论主张和政策要求,还要将关注对象向社区协商实践情况拓展。从社会心理的意义上看,相关社会行为主体的感受,对于相应的社会制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要想真正生成、存在、发展下去,就不仅仅要有其内容与形式以及对其内容与形式的宣传教育,更需要有相关社会行为主体对其作出基于个体和群体感受的判断。有人就曾经在讨论民主时指出,“公民们确信自己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也许是主观的,但却是极端重要的事情……自由和公正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而且是哲学、社会学范畴,但最主要的——这是人的感情”^{[27](P1-9)}。对于社区协商这一重要的社区治理方法来说,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也有着类似的时代价值。访谈中“要让人家有协商的感觉”的观点背后所包含的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强调不仅要关注协商及其制度设计本身,更要关注参与者在实践中的效能感。

其次,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还关系到社区协商实践公信力。社区协商实践公信力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社区协商实践是否具有使公众信任的力量。社区协商实践公信力与社区协商实践参与者们的参与效能感是什么关系?通常而言,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后者的高与低、长与消,直接影响到前者的强与弱。如果社区协商实践参与者们有较好的参与效能感,那么,他们对社区协商就会更加了解和认同。相应地,他们对社区协商实践就越信任。反之,如果社区协商实践参与者们的参与效能感不高,甚至有负向的效能感,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不认同甚至不可能认同社区协

商实践。倘若如此,又遑论社区协商实践公信力呢?正如调研中受访者一种普遍观点所表达的那样:“你把居民和驻区单位的人们都弄一起了,但是他们都不了解协商意味着什么,他们耗费时间体力没啥收获,就光陪玩了,那你怎么让人家相信你搞的协商有用有价值?”

第三,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是社区协商参与者们决定是否还会再参与相关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关系到社区协商实践的可持续性。就正常的心理机制而言,在同等条件下,一项活动的参与者们是否会考虑以后再参与类似活动,往往取决于他们在参与过程中有没有获得美好体验。对于社区协商实践来说,这同样是适用的。调研中受访的北京市某区某镇一位女性居民就曾说:“我们这里协商确实挺好的。以前听别人说,协商都走形式。一开始我们这里搞的时候,我就是看看。2018年冬天因为暖气不够暖,还真协商了,而且我们的问题还真通过协商解决了,还因此多认识了好些人。以后再搞跟我们相关的协商,我还要参与。”这一朴素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社区协商参与者的观点。

第四,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还会对社区治理绩效与党和政府形象塑造产生影响。关于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前述三点现实意义,可以归结为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对社区协商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意义。实际上,除了对社区协商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意义之外,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意义,即关乎社区治理绩效以及党和政府形象塑造。就社区治理绩效而言,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正向而且较好的话,社区协商这一社区治理方式运行效果也就会更好,那么,社区治理绩效也不会太差。同时,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还体现为,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正向而且较好的话,社区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相互理解与支持程度、社会资本情况也都较好。就党和政府形象塑造来说,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社区协商是在党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正向而且较好的话,实际上也就等同于对社区协商过程中党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及基层政府指导的认可;另一方面,社区协商作为党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广大社区群众一

起开展社区治理、履行社区服务职责的方式,如果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正向而且较好的话,就意味着社区群众对党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各项服务相对满意,也意味着对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基于所获服务的积极评价,那么,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形象塑造效果也就更好。

四、衡量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主要维度

相对而言,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有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公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程度、政府信息优势与参与能力三个角度测量公众内在政治效能感;从公民对影响政府行为的可能性、政府官员对民众诉求关心程度以及对政策参与有效性的认知三个方面测量公众外在效能感”^[28]。结合文献的具体阐释,测量内在效能感的维度可以概括为对所参与的活动相关情况的了解、对自身参与能力的评价两个方面;测量外在效能感的维度则可以概括为对参与行为影响所参与活动的判断、对参与行为受党政部门与领导者重视情况的判断、对参与行为影响所参与活动相关联的公共事务的判断。

同时,从具体实践来看,要衡量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还可以从访谈调研所得观点中寻求有启发意义的阐述。截至目前,课题组共开展了6次实践者参与的研讨式座谈、4次深入社区的小范围座谈、9次深度个别访谈。访谈对象共计307人。其中研究者18人,街道(乡/镇)工作者57人,社区工作者119人,社区群众64人,其他职业从业者49人。尽管受访者职业有差异,但他们同时也是生活在某一特定社区的群众。将受访者们的表述汇总归类后,关于社区协商参与的内在效能感,主要有对社区协商的了解情况、对社区协商的重视情况、参与社区协商的品行情况、从自身角度出发能不能好好地参与协商的情况四个方面;关于社区协商参与的外在效能感,主要有感受到的社区协商实行情况、社区协商参与机会平等情况、意见建议受重视情况、协商对社区决策的影响情况、社区协商作用情况五个方面。

综合而言,衡量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理论维度主要有九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属于内在效能感

的范畴,后五个方面则属于外在效能感的范畴。

一是对自身了解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效能感的承载主体对社区协商的了解情况,往往会影响他们的社区协商参与内在效能感甚至整体效能感的准确性。受访者普遍认为:“假如说有一个人,他连社区协商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你还指望他的效能感靠谱吗?”具体地说,对自身了解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通常包括社区协商的含义、社区协商在现实中的存在和运行形式、社区协商在实践中的操作情况、社区协商的作用和边界等。实际上可以说,对自身了解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就是对自身协商知识的判断。

二是对自身重视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了解社区协商是一回事,重视社区协商则是另一回事。效能感的承载主体对社区协商的重视情况,自然应该成为其社区协商参与内在效能感的一个重要表征指标。具体地说,包括其是否重视社区协商,这体现的是其对社区协商积极作用的认可;还包括其在行动上是否能做到优先通过社区协商渠道解决问题,比如其在自身合法合理利益受损时优先采取了怎样的途径去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是对自身参与社区协商品行的判断。按照调研中受访者们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参与社区协商的品行,是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承载主体“在参与具体民主协商活动时所持有的参与德行及其外在的言语和行为表现”。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承载主体参与社区协商的品行,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效能感是否会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即会影响其效能感的客观性。具体地看,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能不能做到理性沟通;会不会认可和践行“有理不在声高”等原则;在考虑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能不能考虑和兼顾他人、集体与国家利益;在他人提出与自己无直接利益相关的主张时,如果自己认为是合理的,会不会支持他人提出的主张;等等。

四是对自身参与社区协商能力的判断。对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承载主体来说,更为重要的内在效能感测量维度,可能还在于其对自身参与社区协商能力的判断。正确地认识和评判自己的社区协商参与能力,做到“既不过度自信,又不要以为自己干啥啥不行”。

发现、概括和反映切身利益问题与社区治理问题的能力怎么样,将问题引入社区协商议程的能力怎么样,在具体社区协商过程中表达诉求提出主张并提供理由的能力怎么样,面对争议时相互论证与批驳或赞同别人观点的能力怎么样,这些都是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承载主体认识和评判自身参与能力应该涉及的。

五是对社区协商经常性的判断。社区协商是不是经常在做,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社区协商感知的高低。所以,调研中很多受访对象都表示:“社区协商是不是经常开展,这在大家脑袋里和心里留下的印象,是要考虑进去的。”当然,关于社区协商的经常性,也不是越常见就越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度。也就是—些受访者所说的,“该做的就做,可以做的就做,不能随便乱做劳民伤财。”社区协商活动是否频繁,其举办频次是适度的、不够的还是过度的,都会影响人们对社区协商感知的高低。

六是对社区协商参与机会平等情况的判断。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在很多时候,协商很难保证所有与特定事宜相关联的人都能参与其中。这一点,在社区协商中,有些时候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涉及全社区或跨社区事宜时,更是如此。古丁认为:“要在大规模的政体中进行真正的民主协商,他们必须以代议的形式参与。”^[29]这种情况,有时在社区协商中也同样存在。这就涉及参与者代表的确定问题,从而出现参与机会及其平等与否的问题。而对社区协商参与机会平等与否的判断,影响着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甚至可以说是影响社区协商参与外在效能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七是对社区协商过程中意见与建议受重视情况的判断。在社区协商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表达的诉求、给出的观点、提供的理由等,有没有得到认真倾听,有没有得到解释和回应,这些都属于对社区协商过程中意见与建议受重视情况的判断范畴。这些对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如调研中有受访者所言:“说得不对,你可以不同意、可以批驳,也可以不采纳,但你不要无视我,那太伤人了。”

八是对社区协商与社区治理决策关联性情况的判断。一切民主协商活动,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本地区相关公共事务治理之决策提供参考,社区协商实践也一样。换句话说,社区协商必然与社区治理决策有关

联性。这种关联性,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社区治理决策对社区协商结果的采纳上。其最关键的体现,在于社区治理决策对社区协商结果的反馈。比如说,社区治理决策有没有采纳社区协商结果,采纳了多少,以什么形式采纳,采纳与否的原因是什么,都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让大家感觉参与社区协商是有用的、有影响力的,至少是能促使相关方面思量协商结果的。

九是对社区协商综合作用的判断。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最终还要落在大家对社区协商综合作用的判断上。这种综合作用,与社区协商决议落实执行创造出的“实际的福利效应”^[30]密切相关。社区民主协商活动再多、机会再平等、对意见建议再重视、与决策的关联性再强,如果最终参与者们没有觉得通过协商对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对自己及家人工作与生活的氛围和环境等各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也不可能高。而对社区协商综合作用的判断,可以围绕对上级方针政策宣传落实的作用、形成公意的作用、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让工作与生活更加美好的作用等方面进行。

五、当前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 实践绩效调研

自中央文件明确而专门地强调社区协商起,至今已近5年。当前,各地社区协商实践也已蓬勃发展。那么,从实践绩效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在调研阶段,我们借助问卷加访谈的方法作了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为前文中受访的那307人。调查问卷回收307份,去除废卷7份,有效问卷300份。在有效问卷中,来自研究者的18份,来自街道(乡/镇)工作者的55份,来自社区工作者的118份,来自社区群众的61份,来自其他职业从业者的48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占比近97.72%。下面,结合本次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资料,简要阐述一下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现状。

关于对自身了解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有70人表示很了解,有135人表示了解一些,有60人表示不了解,有35人表示没听说过。按所占百分比来看,分别

为23.33%、45%、20%、11.67%。据此可以看出,尽管社区协商轰轰烈烈地宣传和实践了较长时间,但对社区协商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的人还占近三分之一。

关于对自身重视社区协商情况的判断。对于“认为社区协商重要吗”的回答,只有15人表示不重要,其余受访者都表示重要(130人)或非常重要(155人)。不过,在涉及自身利益需要时,总是优先通过协商去争取的,经常优先通过协商去争取的,看情况决定是否优先通过协商去争取的,不会优先通过协商去争取的,分别为65人、140人、60人、35人,所占百分比分别为21.67%、46.67%、20%、11.67%^①。这意味着,在观念上认为协商重要的人们,当考虑到自身利益需要时,对协商的重视程度可能会降低。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真正置身于事关自身利益的情境时,对协商的重视程度可能会更低。

关于对自身参与社区协商商品的判断。无论是关于理性沟通,还是关于认可和践行“有理不在声高”等原则或其他方面,调研结果都显现出了较为乐观的状态。就拿对是否能做到理性沟通来说,勾选总是能、经常能、不能、看情况的受访者分别有75人、170人、0人、55人,分别占25%、56.67%、0%、18.33%。对此,受访专家表达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实际上,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自己做得到,毕竟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不会主动否定自己。”

关于对自身参与社区协商能力的判断。当问及“认为自己能不能很好地参与社区协商”时,有55人勾选“总是能”,165人勾选“经常能”,60人勾选“看情况”,20人勾选“不能”,分别占18.33%、55%、20%、6.67%。

关于对社区协商经常性的判断。在结合自身的感受谈自己所在社区举办民主协商活动的经常性时,勾选经常、偶尔、我不确定、没有举办过的受访者分别有80人、100人、50人、70人,所占百分比分别为26.67%、33.33%、16.67%、23.33%。对于上述情况,一些受访者表示,与实际情况相比可能存在不小的偏差。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什么样的活动算是社区民主协商活动或者说运用了民主协商形式,评价者们由于自身对社区协商形式的不熟悉,会导致误判。

^① 因为百分比依据四舍五入的规则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所以有时会出现百分比总和与百分之百略有偏差的现象。

关于对社区协商参与机会平等情况的判断。就参与社区协商的机会而言,有10%的受访者表示,始终受到不合理的人为限制;有25%的受访者表示,多数情况下受到不合理的人为限制;有21.67%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受到不合理的人为限制;只有43.33%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没有受到不合理的人为限制。以上各种情况的具体受访者分别是30人、75人、65人、130人。究其原因,可能与参与者确定方式的运用有关。有105名受访者(即总数的35%)表示,在其所了解的社区民主协商活动中,参与者的确定方式为“有关部门选定”。

关于对社区协商过程中意见与建议受重视情况的判断。就调研所得数据来看,无论是个人的意见建议受重视情况,还是问题本身引起重视、进入协商程序的情况等,所得到的积极评价都不高。始终受到重视和多数情况受到重视两项的勾选者所占百分比之和,在51.67%至66.67%之间。其中,个人的意见建议受重视的情况最不理想,始终如此、多数情况如此、偶尔如此、基本没有的勾选者分别为30人、125人、90人、55人,分别占10%、41.67%、30%、18.33%。

关于对社区协商与社区治理决策关联性情况的判断。在社区工作中,最终采取的社区治理措施对社区协商结果的反馈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协商与社区治理决策的关联性。那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始终给予反馈的,占比为23.33%;多数情况下都会给予反馈的,占比为45%;偶尔会给予反馈的,占比为21.67%;基本没有给予反馈的,占比为10%。上述4个选项,各自对应的勾选者分别为70人、135人、65人、30人。

关于对社区协商综合作用的判断。在受访者们看来,社区协商有作用,但作用有限。就其对上级方针政策宣传落实的作用、形成公意的作用、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让工作与生活更加美好的作用来说,很大或较大两项勾选者所占百分比之和在58.33%至70%之间。这种并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也体现在受访者们对社区协商的总体评价上,很好(90—100分)、较好(75—89分)、一般(60—74分)、不好(0—59分)的勾选者分别为90人、115人、75人、20人,所占百分比分别为30%、38.33%、25%、6.67%。这一情况也反映在受访者口头

表达的内容上。曾有一位受访者指出:“不可否认,一些做得颇有成效的社区,他们的协商,群众参与很有效能感。不过,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如果放在整体水平上来讲,我们的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不会太高。”一位就职于北京市东部某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在一次座谈中提出:“我们社区多年来都在做协商,这些年市里面区里面政策好,街道也大力支持,无论是电梯加装还是物业服务,群众效能感应该都不错。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社区居民,来看我家所在的那个社区,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据我估计,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可能我们家那个社区的协商,效能感50分都到不了。”

六、结 语

通过调研数据可以发现,当前的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普遍不高。无论是内在效能感还是外在效能感总体上都较低,距离理想的状态还有不小差距。另外,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的科学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是,调研中针对那些对社区协商实践有负面评价的人员追问其评价的判断基础时,相当一部分人给出的回应是“耳闻的情况”或“媒体素材”,而非主要依据自身参与的实际体验。同时,在补充调研过程中,就前文中的问卷调查结果与部分受访者开展二次座谈或个别访谈调研的时候,一些受访者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引导效能感承载主体尽可能地作出更为客观科学的判断”。在他们看来,大家很可能会对自己“自信过头”,还有些社区群众因为一时的情绪或一时一己利益而“带着成见与偏见”,等等。

由此可见,关于社区协商参与效能感,不仅仅要追求提高,还要在追求提高的同时,注意追求其科学性。进一步调查分析导致效能感不够高、不够科学的原因,并探索不断促进其优化的对策路径,是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认真面对和做好的课题。根据目前已有的调研资料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协商本身的不成熟、具体社区协商活动的不完善、社区协商促进问题解决的程度较低、社区群众特征等四个方面,接下来,还需进一步筑牢社区协商基础、深化社区协商实践、提升社区协商素养、整合社区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6-13(1).
- [2] 罗燕.让居民担当社区治理主角——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陈越良[DB/OL].http://www.msweekly.com/show.html?id=99910.
- [3] 何包钢.中国协商民主发展最新态势[J].人民论坛,2015(14):66-69.
- [4] 徐锦庚,等.“最大公约数”这样求解[N].人民日报,2018-08-24(16).
- [5] 杨守涛.发展协商民主要提高群众的协商感[N].学习时报,2018-07-23(3).
- [6] 何包钢,吴进进.公共协商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基于连氏市民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2016(9):26-38+157.
- [7] 李强彬,李佳松.村庄异质性、村民协商获得感与村委会工作满意度——基于10个乡镇1987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4):81-90.
- [8] 孔祥利.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协商:主体困境与完善路径——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8(3):64-68.
- [9] 裴志军.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与公共协商参与[J].社会科学战线,2015(11):195-205.
- [10] Klofstad. Civic Talk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 Predispositions [J].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2009(5):856-878.
- [11] Neblo, et al. Who Wants To Deliberate, and Why?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3):566-583.
- [12] 吴兴智.利益分化社会中的协商民主及其有效性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5(7):69-76.
- [13] 韩福国,张开平.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J].浙江社会科学,2015(10):48-61+156.
- [14] 杨守涛.乡镇、街道协商民主实践的案例与经验——以北京为例[J].领导之友,2017(7):10-15.
- [15] Morrell. Deliberation,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J]. Political Behavior,2005(1):49-69.
- [16] Tina Nabatchi, Dragan Stanisevski. Social Inclusion: Building Political Efficacy with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 Conference Papers — Mid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8 Annual Meeting,1-39.
- [17] Ceren. Political Efficacy through 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n Public Hearings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4(2):191-213.
- [18] 林尚立.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基于中国协商民主功能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15(7):16-22.
- [19] 张等文,杨才溢.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及其可持续性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83-88.
- [20] 杨根乔.关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16(1):7-12.
- [21] Iris Marion Young.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 Political Theory,2001(5):670-690.
- [22] Mohamad G. Alkadry. Deliberative Discourse between Citizens and Administrators [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03(2):184-209.
- [23] [美]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4]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2-10(1).
- [25]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7-23(1).
- [26] Craig, Maggiotto. Measuring Political Efficacy [J]. Political Methodology,1982(3):85-109.
- [27] [俄]弗拉季斯拉夫·伊洛泽姆采夫.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28] 李燕,等.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6):35-43.
- [29] Robert E. Good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Within [A]. in James S. Fishkin, Peter Laslett.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54-79.
- [30] 柳建坤,等.社区协商:一种新的社区治理范式[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2):77-82.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Consultation

YANG Shou-tao

*(Department of Leadership, Party School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represents the perception and judgment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consultation and its practice. This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practice, the credibility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practi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initially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consultation participation efficacy, and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ommunity consultation participation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acy, scientific need to guide and so 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consultation democrac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nsultation democracy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and do a good job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its scientificity and constantly promote its optimization.

Key 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mmunity consultation; consultation efficacy

责任编辑:傅建芬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视阈下的 新时代绿色发展探析

刘希刚, 郭 凯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 主要内涵包括三类范畴: 自然界、人与自然界关系以及人类社会。随着世界绿色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贯彻落实, 但在践行绿色发展实践中我国依然面临许多突出问题。步入新时代, 我国应当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 在当前从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现状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探索解决我国绿色发展实践受阻和生态困境的现实问题, 坚持用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推动新时代绿色发展, 并立足本国国情, 走出一条服务于国家新时代绿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 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X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20)02-0090-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绿色发展理念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把绿色发展摆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提出一系列绿色发展目标、条件及路径。这明显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绿色发展道路的思考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当下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时期。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国进一步深化绿色发展理念, 形成关于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论架构, 给当下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开出了一剂治病良方。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物质变换, 就是指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变换, 实现物质的循环往复, 不断再利用的过程。”^{[1](P10)} 马克思将“物质变换”这个生物学概念放入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 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对于我国新时代绿色发展

的研究及解决当前绿色发展实践困境和生态环境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主要内涵

纵观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主要把物质变换思想的内涵集中在三个方面: 自然界、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和阐述, 深入挖掘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中有关绿色的内容, 对指导当前绿色发展的现实诉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 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认为, 自然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是指在自然界范围内的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代谢, 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 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 在整个物质变换过程中处于基础地位, 是实现其他物质变换的前提。自然界的物

收稿日期: 2019-10-19

作者简介: 刘希刚,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 郭凯,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质变换过程包含了两类范畴,第一类是无机界的物质循环。这是自然界本身的必然的物质变化,是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而进行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例如,“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2](P207)}第二类是指有机生命体通过摄取食物和进行新陈代谢活动而引起的物质变换过程。“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3](P90)}对生命体来说,这个过程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素,是生命体不断得到发展进化的基本条件。生命体必须从自然界中取得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同时又将自身产生的废弃物排泄到自然界中,成为自然界发展的营养物质。有机生命体为了获取自身所必需的物质而同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质变换,这样就达到了自然界和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物质循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只有认识、遵循、利用好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

(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为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劳动是人类用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手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P201-P202)}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所需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生产生活消费活动,人类又把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中。这就意味着,人类不仅促进了社会物质的丰裕,同样也在改变着自然。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劳动本身是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的活动,所以人类在进行劳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一定要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中一直起着纽带作用。而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则是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指导下,出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

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P552)}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城市进行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不得不涌入城市。这样就把农村土地的肥力以“衣、食”的形式带到了城市,但是却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了城市的排泄系统中,而不能回到农村土地中。致使土地肥力在不断下降甚至造成永久性流失问题。根据李比希的“取之于土壤的东西必须归之于土壤”的理论,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P916)}。因此,不难看出,在人和土地以及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都对这两者的物质交换过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土地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对当今的生态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变换

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变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就应当认真区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关系。物质变换本身具有人的属性,其目的应当是人类的发展进步。然而,自然界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其价值不容忽视,为此需要我们妥善解决好人与自然的价值联系。对于社会中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是从逻辑的角度去考察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马克思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入手,认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就是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2](P122)}也就是说,在分析商品—货币—商品时,马克思认为“商品—商品”才是“真正的物质交换”。也就是说,这是有用劳动产品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同另一种有用劳动产品之间发生了相互关系。但社会中的物质变换,由于在交换过程中加入了货币,就使整个商品交换过程发生了异化。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资本逻辑贯穿在商品市场的各个角落,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性思维。剩余价值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致使其成为资本家竞相

追逐的对象,也成了资本家的唯一目标。这就直接造成社会中物质变换的“裂缝”。在巨大利益驱使下,资本家不惜牺牲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它们作为自己夺取利润的手段和方式。在资本逻辑下,自然只有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服务才有意义,给自然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污染,如土地、水资源、大气的污染,矿产资源的损失等。在这种逻辑指导下,物质变换就以一种十分“迷离”和“隐蔽”的形式进行。忽视了自然的存在价值,必然造成自然的异化、人的异化,也必然导致社会中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包含着丰富的“绿色发展”逻辑和内容,这说明马克思不但没有忽视自然界的价值,反而开始重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的指导而产生的严峻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要利用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寻求新的发展理念,寻求解决当代中国生态环境出现的各种危机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在新时代的体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的历史后走上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发展道路,但经过多年发展,却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重视绿色发展,纷纷开始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绿色发展方式和道路,各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显著增多。改革开放后,中国也走上了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老路,这一发展模式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借鉴国外经验,绿色发展理念在我国应运而生,也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器。

(一)世界绿色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后,走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工业国家,其生产力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界丰富的资源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现状。与此同时,在人们疯狂追求利益的扭曲心理的驱动下,也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虚假的繁荣背后是人类生态意识的淡化、绿色理念的丧失。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国给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以高度的关注,并号召全球各国一起积极应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一,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挑战与威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主要通过追求经济发展的数量,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则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相互竞争,就把目光集中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这势必酿成资源耗费的急剧增加,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十分严重。工业废物废料、生活垃圾的错误处理以及不合格排放,也是引起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工业文明以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已经严重超越了生态红线,以致环境污染从区域范围蔓延到全球范围,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第二,生态保护运动的兴起。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发达国家接二连三地发布有关绿色环保的计划和政策,不但要进一步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同时把注意力也转到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发展上来。美国提出绿色新政,积极主动地调整能源政策和促进环境保护政策的颁布。2012年7月,日本召开国家战略会议,出台“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调动力量实施绿色产业。发展中国家则根据本国所具有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能源转型发展。其中,巴西抓住自身优势,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生物能源。印度主要通过开采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加产业竞争力。另外,各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多次发起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积极为营造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第三,世界各国在生态保护方面展开积极的对话与协商。2009年12月7日至18日,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参与大会的人员是全球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经过世界各国的努力,最终达成共同的协议。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举行,主题为“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习近平在开幕式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愿意同亚洲各国一道,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4]2012年6月,在巴西举行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框架下实现绿色经济”。2018年6

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大会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改善环境”为主题,会议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与全球精英开展交流与合作,共同努力塑造绿水青山的人居环境。

(二)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内涵,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其实现的基础和条件。习近平一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P121)}“在污染环境的盲目发展上不能执迷不悟,否则,必然要给后世子孙留下沉重的负担。”^{[6](P37)}“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7](P24)}这些话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和渴望,充分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与增进民生福祉的关系,也表现出绿色发展理念在新时代中的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表示,“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8]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抉择。面对自然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严重等严峻形势,对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推进绿色发展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体现出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的关键作用。

(三)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所谓绿色发展理念,就是在生态环境可容纳能力和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可持续、低碳、循环的新型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9](P2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推进绿色发展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8]党中央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阐明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

把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与精神实质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始终。

首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今后我国的发展理念应当坚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7](P29)}这体现出,步入新时期后,对于过去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国应主动放弃,而应该学会走一条既坚持生产力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又不污染自然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要真正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发展。

其次,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很好地表达出尊重自然的观点,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但是,反观现在,在现代科技手段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人们征服自然的心理却开始控制人类,对自然造成更大破坏,于是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人类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越来越凸显。因此,所谓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际上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不动摇。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正向着绿色新时代全面迈进。

第三,绿色发展理念是涉及多方面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的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8]。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绿色发展,是从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手段、发展道路、发展策略等方面解决新时代在生态方面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涉及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绿色发展的统一整体和全方位的绿色发展战略,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始终,是指导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一道“治病良方”。

三、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 面临的突出问题

推进绿色发展是针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而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和解决手段。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向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根据当前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众多突出问题。

(一)生态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空间差异较大。虽然这些年以来,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策略和工程由我国政府纷纷出台并实施。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原先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 and “褐色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这么多年对自然资源的历史性开发利用和无度掠夺,又加之我国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脆弱性,就必然给生态系统造成更加复杂的形势和继续恶化的局面,形成了对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的强大约束力。

在资源环境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区域性、局部性、结构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资源能源的极度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现状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由人口所带来的与资源之间的巨大矛盾,不仅造成资源供给的不堪重负,也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扭转全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现状已迫在眉睫。

(二)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尤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偏向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经济增长速度而轻经济增长质量”,致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环境的逐渐退化。“唯生产力论”“唯GDP论”盛行。如今,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成了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过去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三高三低”型的传统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的基础上的不可持续发展,结果导致资源环境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束缚。因此,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趋势,经济发展方式就亟待整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对传统工业进行

“绿色化”改造,大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让绿色发展战略和绿色发展方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让绿色发展变为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一把关键钥匙。

(三)社会公众绿色意识比较淡薄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因生活中过度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断涌现,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在身边的环境问题上,绿色意识在社会公众中也逐渐增强,但整体上还比较淡薄,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近些年来,一起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例如:厦门和大连的PX项目事件;启东的排污事件;福建汀江污染事件等。这些环境污染事件对公众生活产生了严重危害,也促使公众开始反思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开始追求新的绿色生活状态。

四、坚持以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 推动新时代绿色发展

(一)树立绿色资源观,实现自然资源减量化利用

地球的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在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下,加上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开采和利用,必然导致自然界中物质变换的断裂。地球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有限性。人类在进行社会劳动时,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 and 能源。因此,我们可以从“量”处着手,树立绿色资源观,实现自然资源的减量化利用,从而能够让自然资源达到自我恢复的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提到,“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高到最高限度。”^{[10](P117)}也就是说,前一种节约就是所谓的“循环再利用”,后一种节约就是所谓的“减量化生产”。在马克思看来,降低废弃物的污染,既依赖“末端治理”,也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控制,两头都要抓,达到前后一致,从整体上减少污染,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节能降耗的“减量化生产”。^{[11](P9)}

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减量化利用的思想就是要求我们要坚持树立绿色资源观,用绿色资源观代替资本

主义错误的价值观,把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放在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上,达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生态环境的进步协调一致,自觉走绿色发展道路。用消耗最少的自然资源和产生程度最轻的环境污染换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以达到物尽其用,从而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二) 树立绿色生产观,协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造成的。但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引导下是无法达到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只会引导人类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采和破坏。因此,要实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不但要从制度上改革,还需要在观念上进行变革。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绿色生产观,走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这对我国新时代绿色发展实践有着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引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12](P649)]。人们为了追逐更大利益,于是产生“征服自然”的理念。而马克思提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应转变为“善待自然”,这是人类对自然界观念的根本转变,也是绿色生产观的应有之义。在人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注入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生产观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达到真正合理的调节。新时代,在我国绿色发展实践中,更应该用绿色生产观来指导我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面对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要积极努力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善待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 树立绿色消费观,降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使得资本家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将商品倾销出去,以便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成了资本家诱导人们消费

的主阵地。长此以往,大众消费者便陷入了异化消费的困境中,从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在当今过度消费的社会里,废弃物的排放量也异常增加,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我们亟须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合理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这样才能遏制由于大量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的局面。绿色消费观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建立的。它既服务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合理地填补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断裂的裂缝,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明的消费观。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树立绿色消费观,可以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滥用,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情况获得很大程度的好转。树立绿色消费观,用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指导绿色消费观念,符合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使我国成为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毛新.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2(7):10-1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 习近平.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0-04-11.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6]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8]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2).
- [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蔡陈聪,王艳.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东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5-11.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LIU Xi-gang, GUO Ka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categories: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green development path,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been further implemented, but China still faces many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green development. Stepped into the new era, our country should be based on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urrent in the natur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uman society carry out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explore to solve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realistic problems in the ecological dilemma, insist on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and based on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green new era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x's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era

责任编辑:赵 哲